

任应秋

内经研习拓导

讲稿



中医名家名师讲稿丛书第一辑

任应秋



著

任廷革



整理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任应秋内经研习拓导讲稿/任应秋著.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8. 1

(中医名家名师讲稿丛书·第一辑)

ISBN 978-7-117-09346-0

I. 任… II. 任… III. 内经—研究 IV. R2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61481 号

中医名家名师讲稿丛书·第一辑

任应秋内经研习拓导讲稿

著 者: 任应秋

出版发行: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继线 010-67616688)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群园 3 区 3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http://www.pmph.com>

E-mail: pmph@pmph.com

购书热线: 010-67605754 010-65264830

印 刷: 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5×1000 1/16 印张: 6.25 插页: 2

字 数: 112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117-09346-0/R·9347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打击盗版举报电话: 010-87613394

(凡属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销售部联系退换)



作者简介



任应秋(1914-1984),男,汉族,四川江津人。曾任中华医学会医史分会常务理事、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医专业组召集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医专业组成员、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委员、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等职。是著名的中医学家、中医教育家,曾获北京市劳动模范的荣誉称号。

任应秋从事中医研究、教育、临床50余年,在中医古籍整理、创立中医流派学、研究中医理论体系等方面,成果卓著,享誉全国。他一生专著36种,发表论文200余篇。他的临床以信息丰富、思路开阔为特点,即使是对疑难病种,也能取得很好的疗效。他从教30多年,在本科教育中创立了《中医各家学说》必修课程。他重视中医药文献整理和研究,他研究《伤寒论》的诸多著作和他编写的《中医各家学说》,以及他主编的《内经章句索引》等,都是他运用系统思维在中医文献研究方面的代表作。他对中医学理论研究的贡献,主要反映在他对《内经》学术研究的两个方面:一是对《内经》理论体系的疏理与挖掘;二是对《内经》研究方法的探讨与实践。

任应秋将一生收藏的4000多种中医书籍全部赠送给了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他为中医事业的献身精神在行业人的心中留下了永久的丰碑。



出版者的话

自20世纪50年代始,我国高等中医药院校相继成立,与之相适应的高等中医教育事业蓬勃发展,中医发展史也掀开了崭新的一页,一批造诣精湛、颇孚众望的中医药学专家满怀振兴中医事业的豪情登上讲坛,承担起传道、授业、解惑的历史重任。他们钻研学术,治学严谨;提携后学,不遗余力,围绕中医药各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充分展示自己的专业所长,又能结合学生的认识水平和理解能力,深入研究中医教学规律和教学手段,在数十年的教学生涯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同时,在不断的教学相长的过程中,他们学养日深,影响日广,声誉日隆,成为中医各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中医教育能有今日之盛,他们居功甚伟,而能够得到各位著名专家的教诲,也成为莘莘学子的渴望,他们当年讲课的课堂笔记,也被后学者视为圭臬,受用无穷。

随着中医事业日新月异的发展,中医教育又上升到新台阶。当今的中医院校中,又涌现出一大批优秀教师。他们继承了老一辈中医学家的丰富经验,又具有现代的中医知识,成为当今中医教学的领军人物。他们的讲稿有着时代的气息和鲜明的特点,沉淀了他们多年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

由于地域等原因的限制,能够亲耳聆听名家、名师授课的学生毕竟是少数。为了惠及更多的中医人,我们策划了“中医名家名师讲稿丛书”,分辑陆续出版,旨在使后人学有所宗。

第一辑(共13种):

《任应秋中医各家学说讲稿》

《刘渡舟伤寒论讲稿》

《凌耀星内经讲稿》

《程士德中医学基础讲稿》

《王洪图内经讲稿》

《刘景源温病学讲稿》

《连建伟金匱要略方论讲稿》

《任应秋内经研习拓导讲稿》

《李今庸金匱要略讲稿》

《印会河中医学基础理论讲稿》

《王绵之方剂学讲稿》

《李德新中医基础理论讲稿》

《郝万山伤寒论讲稿》

丛书突出以下特点:一是权威性。入选名家均是中医各学科的创始人或重要的奠基者,在中医界享有盛誉;同时又具有多年丰富的教学经验,讲稿也

是其数十载教学生涯的积淀。入选名师均是全国中医药院校知名的优秀教师,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是本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有较高知名度。二是完整性。课程自始至终,均由专家们一人讲授。三是思想性。讲稿围绕教材又高于教材,专家的学术理论一以贯之,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充分反映其独特思想的专著。四是实践性。各位专家都有丰富的临床经验,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能给读者以学以致用动力。五是可读性。讲稿是讲课实录的再提高,最大限度地体现了专家们的授课思路和语言风格,使读者有一种亲切感。同时对于课程的重点和难点阐述深透,对读者加深理解颇有裨益。

在组稿过程中,我们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大力支持,许多专家虽年事已高,但均能躬身参与,稿凡数易;相关高校领导也极为重视,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在此,对老专家们的亲临指导、对整理者所付出的艰辛努力以及各校领导的大力支持,深表钦佩,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7年12月



前言

“《内经》研习拓导”的作者任应秋 17 岁学习中医,他的启蒙老师原是位经方学家,故授以《公余六种》、《伤寒论浅注》、《金匱要略浅注》等书,任应秋由于深受“先穷经、后证史”的国学学习方法的影响,于是提出增加学习《灵枢》、《素问》的请求。即在他治学之初,就非常注重对中医理论的学习和研究。

任应秋读书很注重方法,光绪元年(1875 年)做四川提督学政的张之洞所著《锺轩语》一书对他的治学方法影响颇深,书中强调“读经宜明训诂,宜讲汉学、宜读国朝人经学书,宜专治一经,治经宜有次第,治经贵通大义”,书中还特别推荐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他从中总结出治《内经》的门径。

任应秋对《内经》的学习和研究首先从章句入手,再从理论体系的层面进行归纳和总结,其中不仅贯穿了训诂、校勘、疏证、读破等基本的文献整理方法,而且还对其进行了类分、语译、提要、索引等深层次的系统研究,在这方面的成果享誉国内外,为此他也成为中医基础理论学科和中医文史学科重要的奠基人之一。晚年他和他在哲学界的朋友一起倡导并开展了多学科研究《内经》的实践,并主编了《黄帝内经研究论丛》一书,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青睐。遗憾的是,在他有生之年,他的《内经学》撰写计划没有来得及实施。

本书是根据任应秋 1976 年为某《内经》研习班所作的讲座手稿整理而成,此稿的内容并不在讲解《内经》原文的具体内容,而是提出学习和研究《内经》首先要明确的一些问题,具有拓导学习的意义。任应秋面对大多学习中医的年轻人不能通读《内经》,即使是研究生要独立地读懂《内经》也非易事的现实深感焦虑,他认为要想研究中医学或成为名中医,没有《内经》的理论知识是不能成功的,中医学的发展也必须在《内经》理论体系的基础上进行。这是任应秋之所以要在《内经》的研究和教学方面下功夫的重要原因。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内经》的文献渊源、《内经》的成书年代、《内经》引用的古代文献、《内经》的校勘、《内经》的注疏、《内经》的分类、《内经》的专题

发挥、《内经》的学术思想、《内经》的理论体系、怎样学习《内经》等。这些内容不仅反映了任应秋毕生研习《内经》的心得,而且还包括了他从学术的层面对《内经》理论进行的梳理和对历史研习《内经》的文献进行的系统总结。这些不仅是今人学习和研究《内经》的重要参考,而且在中医学文献研究的方法上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示范。

任延革

2007年10月





目录

一、《黄帝内经》名释	1
二、《黄帝内经》成书的时代	5
(一)《素问》的成书年代	6
(二)《灵枢》的成书年代	13
(三)《素问》遗篇的年代	16
三、《黄帝内经》引用的古代文献	17
(一)《五色》、《脉变》、《揆度》、《奇恒》	17
(二)《九针》	18
(三)《针经》	18
(四)《热论》	18
(五)《上经》、《下经》、《阴阳》、《从容》	19
(六)《脉经》、《脉法》、《脉要》	20
(七)《形法》	20
(八)《本病》	20
(九)《阴阳十二官相使》	20
(十)《金匱》	21
(十一)《太始天元册文》	21
(十二)《大要》	21
(十三)《刺法》	21
四、《素问》、《灵枢》的书名和卷篇	23
(一)《素问》、《灵枢》的书名	23
(二)《素问》、《灵枢》卷篇的演变	25
五、校勘《黄帝内经》诸家	27
(一)校勘对学习研究《黄帝内经》的意义	27
(二)林亿等的《新校正》	29

(三)胡澍的《素问校义》	30
(四)俞樾的《读书余录》	31
(五)孙诒让的《札迻》	32
(六)顾观光《素问校勘记》、《灵枢校勘记》	33
(七)沈祖緜的《读素问臆断》、《读灵枢臆断》	33
(八)冯承熙的《校余偶识》	34
(九)江有诰的《先秦韵读》	34
(十)于鬯的《香草续校书》	34
(十一)日本校勘诸家	35
六、注解《黄帝内经》诸家	36
(一)单注《素问》诸家	36
(二)全注《素问》、《灵枢》诸家	38
七、分类研究《黄帝内经》诸家	41
(一)兼收并蓄分类法	42
(二)选择性的分类法	49
(三)调整篇次分类法	52
八、专题发挥《黄帝内经》诸家	53
(一)秦越人与《难经》	54
(二)张仲景与《伤寒论》	55
(三)华佗与《中藏经》	56
(四)王叔和与《脉经》	57
(五)皇甫谧与《甲乙经》	59
(六)刘完素与《宣明论方》	60
(七)骆龙吉与《内经拾遗方论》	61
(八)刘浴德、朱练与《重订骆龙吉内经拾遗方论》	61
(九)陈无咎与《明教方》	61
九、《黄帝内经》的学术思想	62
(一)阴阳学说	62
(二)五行学说	64

(三)整体观	66
(四)恒动观	69
十、《黄帝内经》的理论体系	71
(一)藏象学说	71
(二)病机学说	75
(三)诊法学说	76
(四)治则学说	80
十一、如何学习《黄帝内经》	83
(一)内容提要	83
(二)阅读方法	85
(三)选本	87
(四)选注	88
(五)精读	90

祖国医学现存的近万种古典文献中可以称作“经”的,仅有以下九种:《黄帝内经》、《黄帝八十一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金匱要略方论》、《中藏经》、《脉经》、《黄帝针灸甲乙经》、《黄帝内经太素》等。除《神农本草经》外,其余八种都是研究和发挥《黄帝内经》的,于此便可以看出《黄帝内经》的重要性。这些文献究竟是如何研究和发挥《黄帝内经》的?将另作专题来介绍,这里主要就学习和讨论《黄帝内经》所需要明确的几方面问题,提出我的一些看法,或许有助于我们这次的学习。



《黄帝内经》名释

要弄清楚什么叫《黄帝内经》的问题,首先要弄清什么叫“黄帝”?旧的历史学家都把黄帝当作了不起的圣人来看待,如《帝王世纪》说:“黄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姬姓也。母曰附宝,其先即炎帝,母家有蛟氏之女,世与少典氏婚,故《国语》兼称焉。及神农氏之末,少典氏又取附宝,见大电光绕北斗枢星照郊野,感附宝,孕二十五月,生黄帝于寿丘,长于姬水,龙颜,有圣德,受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故因以为名,又以为号。与神农氏战于阪泉之野,三战而克之。力牧、常先、大鸿、神农、皇直,封钜人,镇大山,稽鬼、臾区、封胡、孔甲等,或以为师,或以为将,分掌四方,各如己视,故号曰‘黄帝四目’。又使岐伯尝味百草,典医疗疾,令经方、本草之书咸出焉。其史仓颉,又取象鸟迹,始作文字,史官之作,盖自此始。记其言行,策而藏之,名曰书契。黄帝一号帝鸿氏,或曰归藏氏,或曰帝轩。吹律定姓,有四妃,生二十五子,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岁。”(《太平御览》卷七十九引)

这完全是神话式的描述,但历代史学家往往引此作为根据,惟从历史唯物主义看来,黄帝并不是一个天生的圣人,而是远古时代的一个氏族。《中国通史简编》说:“黄帝族原先居住在西北方,据

传说,黄帝曾居住在涿鹿(河北宣化鸡鸣山)地区的山湾里,过着往来不定,迁徙无常的游牧生活,后来打败九黎族(南方蛮族之一,约为九个部落的联盟,首领即蚩尤)和炎帝族(西戎羌族的一支,传说炎帝姓姜,牛头人身,大概是牛图腾的氏族),逐渐在中部地区定居下来。黄帝姬姓,号轩辕氏,又号有熊氏。古书中有关黄帝的传说特别多,如用玉(坚石)作兵器,造舟车弓矢,染五色衣裳,螺祖(黄帝正妻)养蚕,仓颉造文字,大桡作甲子,伶伦造乐器。虞、夏二代禘祭黄帝(尊黄帝为始祖)。这些传说出于战国、秦、汉时学者的附会,但有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即古代学者承认黄帝为华族始祖,因而一切文物制度都推原到黄帝。”(《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章第三节:关于黄帝及其后裔的传说)

2 黄帝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伟大的氏族,历史中的“仰韶文化”,就是黄帝族文化的代表。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曾经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遗址中的器物有石器、骨器、陶器等多种。石器有刀、斧、杵、锄、镞,及纺织用的石制纺轮,骨器有缝纫用的针,陶器有钵、鼎等形制。这一发现,后被称作“仰韶文化”。仰韶文化散布在广大西北地区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甘肃、青海和陕西等省,以及华北、中原等地区,已被确定的有数十处。在这些遗址和大量的遗物里,从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艺术等几个方面,可以推想当时社会经济和人们生活的状况。

当时的农业在生产部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各遗址多有石斧出土,石斧是当时农业生产的重要工具。遗址多在河谷里,因那里土地肥沃,宜于种植。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东西约560米,南北约800米,许多小屋接连成群,已形成一个村落。西安半坡村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有石斧、骨锄,还有一陶钵粟。当时的畜牧业也是重要的生产部门。仰韶遗址中有许多猪、马、牛的骨骼,猪的大量饲养,说明生活已相当安定。由于弓箭的使用,狩猎生活逐渐过渡到原始畜牧业。各遗址中出土的陶器、陶片最多,且多有纹饰,反映出手工业的发展。纺轮、骨针等各遗址都有,足见纺织与缝纫已成为

普通的手工业。甘肃各遗址墓葬中,多有玉片、玉瑗、海贝,尤其海贝应从新疆来,说明那时已经有了交换关系,早期商业已经萌芽。由于交换关系的持续发展,氏族内部逐渐分化,而且开始有了奴隶。出土的陶器一般是美观的,纹饰杂以犬羊图形,并有人形纹,原始艺术也有所体现。

仰韶文化距离现代约有四五千年,从当时人们的生活状况来看,农业、畜牧业已经是重要的生产部门,陶器、武器和一般工具,种类颇多,说明手工业也在发展。因此药物的发现,医药经验的积累,在这个时期是完全有可能的。《帝王世纪》说:黄帝使“岐伯尝味草木,典医疗疾,今经方、本草之书咸出焉。”(《太平御览》、《路史》、《初学记》等都有引)这个传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正因为黄帝氏族文化的发展是多方面的,从无到有的盛况也是空前的,所以历代的人们都以自己是黄帝的子孙为荣,为了溯本思源,各方面的文献往往都冠以“黄帝”字样,以示学有本根,就不足为奇了。

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以“神农”、“黄帝”名书的实在不少。如:道家有《黄帝四经》四篇、《黄帝铭》六篇、《黄帝君臣》十篇、《杂黄帝》五十八篇;阴阳家有《黄帝泰素》二十篇、《黄帝》十六篇;农家有《神农》二十篇;小说家有《黄帝说》四十篇;兵法家有《神农兵法》一篇;天文家有《黄帝杂子气》三十三篇;历谱家有:《黄帝五家历》三十三篇;五行家有《黄帝阴阳》二十五卷、《黄帝诸子论阴阳》二十五卷、《神农大幽五行》二十七卷;杂占家有《黄帝长柳占梦》十一卷、《神农教田相土耕种》十四卷;医经家有《黄帝内经》十八卷;经方家有《泰始黄帝扁鹊俞拊方》二十三卷、《神农黄帝食禁》七卷;房中家有《黄帝三王养阳方》二十卷;神仙家有《黄帝杂子步引》十二卷、《黄帝岐伯按摩》十卷、《黄帝杂子芝菌》十八卷、《神农杂子技道》二十三卷等。

以上充分说明诸家均托言“黄帝”以成书,或托言“神农”以成书,其朴素的意义,仍不外溯源崇本而已。《淮南子》说:“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

(《淮南子》卷十九《修务训》)所谓“尊古贱今”的人是有的,但不能说都是如此,例如每个汉族人无不自以为是黄帝的子孙,就不是什么“尊古贱今”的问题了。

为什么叫《黄帝内经》?从《汉书·艺文志》有关古代医书的目录来看,便可以一目了然。目录如下。

《黄帝内经》十八卷

《外经》三十七卷

《扁鹊内经》九卷

《外经》十二卷

《白氏内经》三十八卷

《外经》三十六卷

《旁篇》二十五卷

看来“内”和“外”,只是相对之称而已,别无深义,这和《韩诗内传》、《韩诗外传》,《春秋内传》、《春秋外传》,《庄子》的《内篇》、《外篇》,《韩非子》的《内储》、《外储》,都是同一意义。内、外相对之称,犹有不能包括的内容,则设“旁篇”以概之,如《白氏旁篇》。至吴昆的《素问注》、王九达的《内经合类》并云:“五内阴阳之谓内。”张介宾《类经》谓:“内者,生命之道。”作为后世的一种理解是可以的,命名的初义未必如此。“经”字,孔安国训为“常”,刘熙释为“径”,陆德明《经典释文》则谓:“经者,常也,法也,径也,由也。”这些意义,都有可取之处,因古人往往把具有一定法则,又为一般所必须学习和掌握的书籍,都称做“经”。高深的如儒家的“六经”、老子的《道德经》之类,浅近的如《三字经》、《四字经》之类,《黄帝内经》便属于前者。有人认为“经”和“纬”也是相对之称,所以既有“经书”,又有“纬书”。但是,一般“经书”在前,“纬书”随后,故“纬书”都是解释“经书”的,如《易纬》、《书纬》、《诗纬》、《礼纬》、《乐纬》、《春秋纬》、《孝经纬》均属之。即是说先有《易经》之后,再以《易纬》配之,先有《书经》之后,再以《书纬》配之,与《内经》、《外经》之义迥别,故“经纬”之说,不足以释其义。

《汉书·艺文志》说：“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至齐之德，犹慈石取铁，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愈为剧，以生为死。”“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这是关于人体生理方面的知识，是藏象学说中的内容；“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这是讨论病机；“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至齐之德，犹慈石取铁，以物相使”，这是立法施治，处方遣药。藏象、病机、治疗，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称之为“经”是适当的，与《黄帝内经》的内容是复合的。可惜《汉书·艺文志》所载的医经七家，仅存《黄帝内经》一家了，其他六家，均已佚逸，无复存者。



《黄帝内经》成书的时代

据上所述，《黄帝内经》之所以冠以“黄帝”，仅仅是溯源崇本的用思，藉以说明我国的医药文化渊源甚早。《黄帝内经》既非是言实有黄帝之圣，留下这样一部伟大的著作，也不等于说《黄帝内经》是在黄帝时代就有的典籍。那么，《黄帝内经》究竟成书于什么时代呢？据宋臣高保衡等校正《黄帝针灸甲乙经》的序文：“或曰《素问》、《针经》、《明堂》三部之书，非黄帝书，似出于战国。”说明早在公元十一世纪中期，就有人怀疑《黄帝内经》不是黄帝著的书，而是到了战国时期才有的。但是宋臣高保衡等对这一观点，怀疑，是抱否定态度的，他们说：“人生天地之间，八尺之躯，藏之坚脆，府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十二经之气血大数，皮肤包络其外，可剖而视之乎？非大圣上智，孰能知之？战国之人何与焉。大哉！《黄帝内经》十八卷，《针经》三卷，最出远古。”（《新校正黄帝针灸甲乙经序》）

尽管宋臣高保衡等对“似出战国”之说持否定态度，但说无论据，仅凭空说一些“大圣上智”、“最出远古”一类浮泛虚饰之词而

已。揆诸实际，“似出战国”这一怀疑的提出是很有道理的，不过亦不能谓为尽出于战国。正如吕复说：“《内经素问》，世称黄帝岐伯问答之书，及观其旨意，殆非一时之言，其所撰述，亦非一人之手。刘向指为韩诸公子所著（指《汉书·艺文志》阴阳家著录的《黄帝泰素》二十篇，师古注引刘向《别录》语），程子谓出于战国之末。而其大略正如《礼记》之萃于汉儒，而与孔子、子思之言并传也。”（元戴良《九灵山房集·沧州翁传》引）

因此，关于《黄帝内经》成书的时期问题，就不能简单化，必须按照具体问题，作出具体的分析，即是要按照《黄帝内经》具体内容进行分析，如《黄帝内经》有《素问》、《灵枢》两大部分，两部分又各有八十一篇，既非出自一时，更非出自一人，不能不按其内容的实际情况，分别进行恰如其分的分析。

（一）《素问》的成书年代

《素问》的成书时期，总的说来，一般都倾向于是战国（公元前403 到公元前 221 年）时代的作品。

1. 宋朝学者的见解

邵雍，字尧夫，宋朝，范阳人，精于《易》学，是百源学派的宗师；著有《观物篇》、《皇极经世》等书。他在《经世》书里说：“《素问》、《阴符》，七国时书也。”（《经世·心学第十二》）

程颢，字伯淳，人称明道先生，精于《易》学，著有《识仁篇》、《定性书》等。他说：“《素问》书，出战国之末，气象可见。若是三皇五帝典坟，文章自别，其气运处，绝浅近。”（《二程全书·伊川先生语》）

司马光，字君实，宋朝，夏县人，曾相宋哲宗，著有《资治通鉴》。他与范景仁书云：“谓《素问》为真黄帝之书，则恐未可。黄帝亦治天下，岂终日坐明堂，但与岐伯论医药针灸耶？此周、汉之间，医者依托以取重耳。”（《传家集·书启》）

朱熹，字元晦，宋朝，婺源人，为宋代理学大师，著作甚富，经后人整理成《朱子全书》六十六卷。其《古史余论》云：“至于战国之

时,方术之士,遂笔之于书,以相传授,如列子之所引,与夫《素问》、《握奇》之属,盖必有粗得其遗言(指黄帝)之仿佛者,如许行所道神农之言耳。”

2. 明朝学者的见解

方孝儒,字希直,明朝,宁海人。著有《逊志斋稿》、《侯成集》、《希古堂稿》等,他说:“世之伪书众矣,如《内经》称黄帝,《汲冢书》称周,皆出战国、秦、汉之人。故其书虽伪,而其人近古,有可取者。”(《逊志斋稿·读三坟书》)

方以智,字密之,号曼公,明朝,桐城人,著有《通雅》、《物理小识》等书。其于《通雅》云:“守其业而浸广之,《灵枢》、《素问》也,皆周末笔。”

3. 清朝学者的见解

魏荔彤,字赓虞,清朝,柏乡人,著有《伤寒论本义》、《金匱要略方论本义》。其于《伤寒论本义·自序》云:“轩岐之书,类春秋,战国人所为,而托于上古。”

崔述,字武承,清朝,大名人。于所著《补上古考信录·黄帝说》云:“世所传《素问》一书,载黄帝与岐伯问答之言,而《灵枢》、《阴符经》,亦称为黄帝所作,至战国诸子书述黄帝者尤众。”

4. 笔者见解

通过上述诸家之论可以明确地说:《素问》基本可以肯定是战国时代的作品,是否其内容百分之百都是呢?还要作进一步的具体分析。

(1)《黄帝内经》主体文献的产生年代

现存《素问》的全部内容,可分作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内容,即除七篇大论以外的部分,可以称其为《素问》的前期文献,上述诸家所说《素问》成书于战国,就是指的这部分文献而言,内容最多,凡七十余篇,其中主要内容,与战国时代的《周礼》一书两相比较,便足以充分证明《素问》和它是一个思想体系。

例如《周礼》云:“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

滑甘。”(《周礼·食医》)而《素问·金匱真言论》则略谓:“东方,味酸,生于春;南方,味苦,生于夏;中央,味甘;西方,味辛,生于秋;北方,味咸,生于冬。”

又如《周礼》云:“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疝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周礼·疾医》)而《素问·金匱真言论》即言:“春气者病在头。”惟“夏取分腠”,“分腠治肌肉”,(《灵枢·寒热病》)分腠、肌肉,都是痒疥疾所发之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复谓:“夏伤于暑,秋必痎疟。”“秋伤于湿,冬生咳嗽。”其言四季之疾之相同又如此。

《周礼·疾医》言:“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而《素问·藏气法时论》即统言:“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并具体提出:“肝色青,宜食甘,粳米、牛肉、枣、葵皆甘;心色赤,宜食酸,小豆、犬肉、李、韭皆酸;肺色白,宜食苦,麦、羊肉、杏、薤皆苦;脾色黄,宜食咸,大豆、豕肉、栗、藿皆咸;肾色黑,宜食辛,黄黍、鸡肉、桃、葱皆辛。辛散,酸收,甘缓,苦坚,咸栗。”

《周礼·疾医》言:“以五气、五声、五色视其死生。”而《素问》则述之更详。例如:《素问·平人氣象论》有“肝藏筋膜之气也”、“心藏血脉之气也”、“脾藏肌肉之气也”、“藏真高于肺,以行营卫阴阳也”、“肾藏骨髓之气也”,此所谓五气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肝)在声为呼”,“(心)在声为笑”,“(脾)在声为歌”,“(肺)在声为哭”,“(肾)在声为呻”,此为所谓五声也。《素问·五藏生成》云:“青如翠羽者生,赤如鸡冠者生,黄如蟹腹者生,白如豕膏者生,黑如乌羽者生,此五色之见生也。”“色见青如草兹者死,黄如枳实者死,黑如炁者死,赤如衄血者死,白如枯骨者死,此五色之见死也。”

《周礼·疾医》还说:“两之以九窍之变,参之以九藏之动。”而《素问·六节藏象论》云:“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其气,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素问·金匱真言论》则谓“(肝)开窍于目”,“(心)开窍于耳”,“(脾)开窍于口”,“(肺)开窍

于鼻”，“(肾)开窍于二阴”。目二、耳二、鼻孔二、口一、前后阴共为九窍，上窍七，下窍二，当其有病变，必两参之而不失。又《素问·六节藏象论》云：“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三而三之，合则为九，九分为九野，九野为九藏。故形藏四，神藏五，合为九藏以应之也。”王冰解释说：“形藏四者，一头角，二耳目，三口齿，四胸中也……神藏五者……肝藏魂，心藏神，脾藏意，肺藏魄，肾藏志也。”当其有病变也，或诊形藏部位之脉，或诊神藏部位之脉，亦必两参之，斯为万全。

看来《周礼》所言者略，《素问》所言者详，毕竟《周礼》不是医书，而《素问》乃专言医者，虽然详略有所不同，而其理论体系则毫无差异处，既然肯定《周礼》为战国时书，则《素问》之为战国时书，似无任何疑义矣。

再以《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为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说：“扁鹊过齐，齐桓侯客之，入朝见，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谓左右曰：‘医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为功。’后五日，扁鹊复见，曰：‘君有疾，在血脉，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不悦。后五日，扁鹊复见，曰：‘君有疾，在肠胃间，不治将深。’桓侯不应。扁鹊出，桓侯不悦。后五日，扁鹊复见，望见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问其故，扁鹊曰：‘疾之居腠理也，汤熨之所得也；在血脉，针石之所及也；其在肠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虽司命无奈之何。’”

扁鹊对齐桓侯辨证和论治的理论，可说均出自《素问》。《素问·缪刺论》说：“夫邪之客于形也，必先舍于皮毛。留而不去，入舍于孙脉。留而不去，入舍于络脉。留而不去，入舍于经脉，内连五藏，散于肠胃，阴阳俱感，五藏乃伤。此邪之从皮毛而入，极于五藏之次也。”扁鹊所谓的在腠理、在血脉、在肠胃、在骨髓，完全是《素问·缪刺论》理论在临证的具体运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还说：“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府，其次治五藏。治五藏者，半死半生也。”扁鹊以汤熨治腠理，以针石治血脉，

以酒醪治肠胃,在骨髓则无奈之何的理论,与此可谓毫无二致。以此说明《素问》的成书,决不会后于扁鹊。

再可以《素问》的文体为证。先秦之文,多作韵语,除五经而外,他如《文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鹖冠子》、《鬼谷子》等,都是如此。而《素问》的《上古天真论》、《四气调神大论》、《生气通天论》、《阴阳应象大论》、《脉要精微论》、《三部九候论》、《宝命全形论》、《八正神明论》、《离合真邪论》、《刺要论》、《刺禁论》、《调经论》诸篇文献,其中作韵语的文字非常多,都非后世之文所可比拟。特别是《八正神明论》最末一段云:“何谓形?何谓神?愿卒闻之。岐伯曰:请言形,形乎形,目冥冥,问其所病,索之于经,慧然在前,按之不得,不知其情,故曰形。帝曰:何谓神?岐伯曰:请言神,神乎神,耳不闻,目明心开而志先,慧然独悟,口弗能言,俱视独见,适若昏,昭然独明,若风吹云,故曰神。三部九候为之原,九针之论不必存也。”真、文、元交错相叶,古韵铿然。无怪顾亭林说:“其文绝以《荀子·成相篇》。”(见《日知录》卷二十一)《成相篇》是《荀子》书中最出色的一篇韵文,亭林以之比拟,其推崇之意,可以知矣。

综观以上三点,《素问》的第一部分文献,以《周礼》、《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注明其学术思想,并从其文字结构来看,说明均出于先秦,并不可能迟于扁鹊以后,这一点是基本可以肯定的。

(2) 七篇大论的产生年代

《素问》的第二部分文献,主要指《天元纪大论》、《五运行大论》、《六微旨大论》、《气交变大论》、《五常政大论》、《六元正纪大论》、《至真要大论》七篇,也就是王冰所说的得先师所藏之卷。还包括《六节藏象论》前面一段,也就是“岐伯对曰,昭乎哉问也”至“孰少孰多,可得闻乎”七百十六字,据林亿等的《新校正》云:“全元起注本及《太素》并无,疑王氏之所补也。”其内容又与大论之文相同,《新校正》的怀疑是有理由的。因此,也把它算做第二部分文献。这样看来,这第二部分,全是王冰所补的。

王冰究竟根据什么来补的呢?林亿等说:“详《素问》第七卷亡

已久矣。按皇甫士安，晋人也，序《甲乙经》云亦有亡失。《隋书·经籍志》载梁《七录》亦云：‘止存八卷。’全元起，隋人，所注本乃无第七。王冰，唐宝应中人，上至晋皇甫谧甘露中，已六百余年，而冰自谓得旧藏之卷，今窃疑之。乃观《天元纪大论》、《五运行论》、《六微旨论》、《气交变论》、《五常政论》、《六元正纪论》、《至真要论》七篇，居今《素问》四卷，篇卷浩大，不与《素问》前后篇卷等。又且所载之事，与《素问》余篇略不相通。窃疑此七篇，乃《阴阳大论》之文，王氏取以补所亡之卷，犹《周官》亡《冬官》，以《考工记》补之之类也。又按汉张仲景《伤寒论·序》云：‘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是《素问》与《阴阳大论》，两书甚明，乃王氏并《阴阳大论》于《素问》中也。要之，《阴阳大论》亦古医经，终非《素问》第七矣。”（新校正王冰序注）我基本同意“新校正”的看法。

至于这部分的内容，主要是讲五运六气的规律和变化，及其对人体疾病的影响。《素问》里一再提到“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既见于《举痛论》，又见于《气交变论》）更提到“人与天地相参”。（见《咳论》）即是说人位置于大自然之中，自然界的气候变化，与人的健康和疾病的关系必然很密切，人便得以从认识自然的规律入手，进而适应大自然的变化，使人能更好地生存于大自然之中，这就是“五运六气”的基本精神。

既承认几篇大论是古医经之一，那么，究竟古到什么程度呢？是否如缪希雍所说：“原夫五运六气之说，其起于汉魏之后乎！何者？张仲景汉末人也，其书不载也。”（《本草经疏》）张仲景书不是不载，而是载得较少。例如《金匱要略》云：“问曰：有未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不去，有至而太过，何谓也？师曰：冬至之后，甲子夜半少阳起，少阳之时阳始生，天得温和，以未得甲子，天因温和，此为未至而至也。以得甲子，而天未温和，此谓至而不至也。以得甲子，而天大寒不解，此谓至而不去也。以得甲子，而天温如盛夏五六月时，此为至而太过也。”这讲的完全是运气的内容。

赵以德的《金匱方论衍义》说：“考之《内经》，候气至不至，有谓

四时者,有谓五运者,有谓六气者,发明详矣。至四时,则曰:‘天以六六为节,地以九九制会,六甲终岁,三百六十日法也。’五日为一候,三候为一气,六气为一时,四时为一岁,而各从其主治焉。求其气之至也,皆从春始,未至而至,此为太过。则薄所不胜乘所胜也,命曰气淫。至而不至,此为不及,则所胜妄行,而所生受病,所不胜薄之也。命曰气迫。((《素问·六节藏象论》))然在脉应,春弦、夏钩、秋毛、冬石,太过者,病在外,不及者,病在内。在‘五运相袭,而皆治之。’(见《六节藏象论》)终期之日,阳年先天而至,当岁之运,则气太过;阴年后天而至,当岁之运,则气不及。与其年和,则非太过不及而平。与司天地气不和,则胜而报复,复则郁发,待时而作,作则风湿燥热火寒之气,非常而暴。(胜复郁发诸气,均见六元正纪、至真要两论)在六气,则曰六气之胜。‘清气大来,燥之胜也,风木受邪,肝病生焉。热气大来,火之胜也,燥金受邪,肺病生焉’(见《至真要大论》)之类。其在脉应则曰:‘厥阴之至弦,少阴之至钩,少阳之至大而浮,阳明之至短而涩,太阳之至大而长。’‘至而和则平,至而甚则病,至而反则病,至而不至者病,未至而至者病,阴阳易者危。’(见《至真要大论》)由是观之,仲景言四时之定法者,若遇气运加临主位,则必将奉天政之寒温,虽与四时气有反者,难为逆时也,候同也。且《经》曰:‘主胜逆,客胜从。’(见《至真要大论》)又曰:‘必先岁气,毋伐天和。’(《五常政大论》)此又不在独守四时之气,而参之以运气者矣。”赵氏《衍义》以运气说释仲景是正确的。因“至而至,至而不至”等提法,基本就是从《素问·六微旨大论》来的,并不是仲景的创说。仲景即曾言运气,则运气说自当在仲景之先,而不是如缪希雍所说,是在“汉魏之后”。

又先到什么时限呢?从七篇大论以甲子纪年来说,不会晚于东汉。因东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颁布四分历,便已开始用甲子纪年了。虽然说甲子纪年是从东汉章帝始,不等于说“运气”也是从这时开始,只能说运气学到了东汉章帝时采用了甲子纪年的方法,因这一方法比用“岁阴”、“岁阳”纪年,既有意义,而又方便得

多。又如“运气”中纪月的方法，都是正月建寅，二月建卯，三月建辰，在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颁布太初历就开始了，所以不能推到章帝以后。

再从文字音韵来看，几篇大论中的有韵之文，比之于第一部分诸篇，并不减色。例如《素问·天元纪大论》云：“太虚寥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五运终天。布气真灵，揔统坤元。九星悬朗，七曜周旋。（以上元真合韵）曰阴曰阳，曰柔曰刚。幽显既位，寒暑弛张。生生化化，品物咸章。（阳部韵）”又如《素问·至真要大论》云：“彼春之暖，为夏之暑。彼秋之忿，为冬之怒。（上声鱼部韵）谨按四维，斥候皆归。其终可见，其始可知。（支脂通韵）”因此，我认为第二部分的内容，至迟亦应该断至东汉以前。

综上所述，《素问》的成书时代基本可以肯定是战国至东汉这一时期，经过多数医家逐渐汇集而成，这是就笔之于书而言。至其学术思想，以及许多内容的流传，应当说要比这早得多。因笔之于书时，不可能都是各个医家的创说，而是各有师承和祖述的。

（二）《灵枢》的成书年代

要明确《灵枢》的成书年代，首先要弄清楚《灵枢》的真伪。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灵枢》是“好事者于皇甫谧所集《内经》中抄出之文”。元代吕复指《灵枢》系王冰以《九灵经》之更名。（见戴良《九灵山房集·沧州翁传》）清代杭世俊《道古堂集》说《灵枢》：“文义浅短，为王冰所伪记。”晁、吕、杭三氏之说，是否可成立呢？答案都是否定的，参见下列三家所论，便一目了然了。

陆心源《仪顾堂题跋》云：“愚案《灵枢》即《针经》，见于《汉书·艺文志》皇甫谧《甲乙经》序，并非后出。《灵宝注》以针有九名，改为《九灵》，又以十二经络分为十二卷，王冰又因《九灵》之名而改为《灵枢》，其名益雅，其去古益远，实一书也。请列五证以明之。皇甫谧《甲乙经》序曰：‘《七略》、《艺文志》：《黄帝内经》十八卷，今《针经》九卷，《素问》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内经》也。又有《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皆黄帝岐伯选事也。三部同归，文多重

复，乃撰集三部，使事类相从，为十二卷。’今检《甲乙经》，称《素问》者，即今之《素问》。称黄帝者，验其文即今《灵枢》，别无所谓《针经》者，则《针经》即《灵枢》可知，其证一也。《灵枢》卷一，《九针十二原》已云‘先立《针经》，’是《针经》之名，见于本书。其证二也。王冰云：‘《灵枢》即《黄帝内经》十八卷之九。’与皇甫谧同，当是汉以来相传之旧说，其证三也。杨上善隋初人也，所著《黄帝内经太素》、《黄帝内经明堂类成》中土久佚，今由日本传来。其书采录《灵枢经》文，与《素问》不分轩輊，与《甲乙经》同，是汉唐人所称《内经》，合《素问》、《针经》而言，非专指《素问》明矣，其证四也。《灵枢》义精词奥，《经筋》等编，非圣人不能作，与冰《素问》注相较，精粗深浅，相去悬殊，断非冰所能伪托，其证五也。”（《仪顾堂题跋·灵枢经跋》）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又补充陆氏的第一、第三两点说：“夫皇甫谧以《针经》、《素问》为《内经》，王冰以《素问》、《灵枢》为《内经》，《针经》、《灵枢》卷数相合，盖一书而二名耳。谧去古未远，其言当有所受之。冰邃于医学，唐时《针经》具在，必不舍流传有绪之古书，而别指一书以当《内经》，断可识矣。《玉海》卷六十三引《书目》（按即《中兴馆阁书目》）云：‘《黄帝灵枢经》九卷，黄帝、岐伯、雷公、少俞、伯高问答之语。’隋杨上善序：凡八十一篇，《针经》九卷大抵同，亦八十一篇。《针经》以《九针十二原》为首，《灵枢》以《精气》为首（按今本《灵枢》，实以《九针十二原》为第一篇，而无《精气篇》，与《中兴书目》不同，盖《书目》据杨上善本，今所传为史崧所上，乃别一本也。《精气篇》疑即今之《决气篇》，篇中首论精气），又间有详略。王冰以《针经》为《灵枢》，故席延赏云：‘《灵枢》之名，时最后出。’（《汉艺文志考证》卷十引较略，《宋史·艺文志》席延赏《黄帝针经音义》一卷）是《灵枢》即《针经》，宋人书目，具有明文，其时《针经》尚存，以之两相对勘，见其文字相同，实一书而二名，故能言之确切如此。”

以上陆心源的五证，和余嘉锡的佐证，足以说明《针经》、《灵

枢》，名虽二而书实一，或者说是同一书的两种版本，决不是两种不同的书，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至于有人说《灵枢》的文字比《素问》浅薄，因而怀疑其为伪出，如吕复、杭世俊、日本丹波元简父子都持这一论调，究其实质，并不如此。正如黄以周所说：“或又谓《素问》义深，《九卷》义浅。夫《内经》十八卷，乃医家所集，本非出一人之手。论其义之深，《九卷》之古奥，虽《素问》不能过。其浅而可鄙者，《素问》亦何减于《九卷》？《九卷》之于《素问》，同属《内经》。《素问·通评虚实论》中有黄帝骨度、脉度、筋度之问，而无对语，王注以为具在《灵枢》中，此文乃彼经之错简。皇甫谧谓《内经》十八卷，即此二书，可谓信而有证。《素问·针解》之所解，其文出于《九卷》，‘新校正’已言之。又《方盛衰论》言：‘合五诊，调阴阳，已在《经脉》。’《经脉》即《九卷》之篇目，王冰注亦言之，则《素问》之文，且有出于《九卷》之后矣。《素问》宗此经，而谓此经不逮《素问》，可乎？”（《傲季文钞·黄帝内经九卷集注序》）

黄氏说：“《九卷》之古奥，虽《素问》不能过，其浅而可鄙者，《素问》亦何减于《九卷》？”这话是很有道理的。例如《灵枢》最前面十篇文献从《九针十二原》到《经脉》浩浩瀚瀚，其笔仗的坚峭朴厚，比之《素问》诸篇，实有过之而无不及。特别是《本输》、《小针解》两篇，境界之大，气势之雄，实为两经之冠。所以周学海说：“非三代上之圣人不能作……《尔雅》尚难抗行，世必谓秦汉诸子为之，试取《吕氏春秋》、《淮南子》诸篇及郑孔注疏读之，岂能望其肩背。”（《内经评文·灵枢》）

“圣人”之说虽不可取，其文章气象，确是秦汉以前的作品，这一点也是毫无疑义的。相反，如《素问》的《宣明五气》、《血气形志》等篇，篇法文势，都较卑弱，而《灵枢》中的《外揣》、《背腧》、《寒热》诸篇，亦直与之等。故从文笔方面来作《素问》、《灵枢》两书的比较，是没有多大优劣之分的。因而《灵枢》晚出之说，亦不能成立。当然，它亦和《素问》一样，个别的内容，是比较晚的。如《阴阳系日月》说：“寅者，正月之生阳也。”显然是汉武帝颁布太初历以后的记

载。于此,我的结论是:《灵枢》基本上是《素问》的姊妹篇,并不比《素问》晚出。《黄帝内经》十八卷,《素问》、《灵枢》各居其九,这一说法是正确的。

根据以上的分析,《灵枢》和《素问》一样,基本上成书于战国时代,只是个别的篇卷,渗入了汉代的東西,因而《黄帝内经》亦并不是成于某一人之手。

(三)《素问》遗篇的年代

最后谈谈《素问》遗篇的问题。《素问》中有《刺法论》和《本病论》两篇,据王冰编次本来说,《刺法论》居七十二,《本病论》是第七十三篇。当王冰次注的时候,这两篇已经不存在了,仅于目录中保存两论的篇名,并注明“亡”。但到了宋刘温舒著《素问入式运气论奥》,又附列这两篇,并另题名为《素问遗篇》。温舒里居不详,惟前有元符己卯(哲宗十四年,公元1099年)自序,并题“朝散郎太医学司业”。林亿等校《素问》时,亦曾见到,故其《新校正》略谓:“详此二篇,亡在王冰之前,按《病能论》篇末,王冰注云:‘世本既阙第七二篇’,谓此二篇也。而今世有《素问亡篇》仍托名王冰为注,辞理鄙陋,无足取者。”

《素问》遗篇主要是讲运气升降,迁正退位等内容,其辞理确是鄙陋,不能与两经相比。究为何人所伪,不得而知。惟周学海说:“二篇义浅笔稚,世皆斥其伪矣。揣其时当出于王启玄之后,刘温舒之前,决非温舒所自作也。时有古义杂出其间,如入疫室者,先存想五脏之神,见于《巢氏病源候论》,即其分辨五疫、五疔,成于三年,俱卓有精义,必有所受之矣。第篇中仅排次其位,而无所发明其理,注中更引用咒语,尤为鄙俚。故二篇者,纪数之文也,不当以义理绳之。”(《内经评文·素问遗篇》)

要之,《素问》遗篇肯定是伪书,其所伪的时代,不出于唐、宋之间,内容的实际意义不大,惟传“小金丹”一方,时或有用之者。



《黄帝内经》引用的古代文献

由上所说,无论《素问》或《灵枢》都是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前前后后经过若干人之手,逐渐整理补充而成,从《素问》来说,全元起注本的篇卷,与王冰注本的篇卷大不一样,从《灵枢》来说,据《中兴馆阁书目》所载:“《针经》以《九针十二原》为首,《灵枢》以《精气》为首。”而现存的《灵枢》,首篇却是《九针十二原》,但又无《精气》。证明两书在各个历史时期,是经过若干次不同的整理、修订,才流传到现代的。据两书现存的内容看来,在成书到修订的过程中,是采纳了不少当时还存在的若干古代文献的,甚至可以说这些文献就是《黄帝内经》成书的基础,也可以说是《素问》成书的基础。因为考据当时的二十一种文献,都在《素问》中出现,仅其中的《刺法》,兼见于《灵枢》。兹将各个文献分别叙述如下。

17

(一)《五色》、《脉变》、《揆度》、《奇恒》

《五色》、《脉变》、《揆度》、《奇恒》等四种文献,首见于《素问·玉版论要》,文曰:“《五色》、《脉变》、《揆度》、《奇恒》,道在于一。”马蒔注云:“俱古经篇名,《灵枢》第六卷有《五色篇》。《经脉别论》亦有《阴阳》、《揆度》等名。”(见《素问注证发微》)顾观光《素问校勘记》同意马注的看法,认定是“古经篇名”。

《五色》是否即《灵枢》的《五色》,还难作定论。但是《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公澄阳庆所授淳于意的书中,确有《五色诊》一种,并记载其善以“五色诊病”,故可知其属于“望诊”古文献。且下文有“容色见上下左右,各在其要”一段,也足以证其为“望色”古文献无疑。

《脉变》,从下文“搏脉,痹痿,寒热之交。脉孤为消气,虚泄为夺血。孤为逆,虚为从”一段看来,是一部讲脉搏变化的古文献。

《揆度》除见于《素问·玉版论要》外,再见于《素问·疏五过

论》和《素问·病能论》。《素问·玉版论要》说：“揆度者，度病之浅深也。”《素问·病能论》说：“揆度者，切度之也。”“所谓揆者，方切求之也，言切求其脉理也；度者，得其病处，以四时度之也。”即言切求其脉理和度病之浅深，似仍属于“脉法”古文献的范围。

《奇恒》在《素问》中凡四见。一见于《玉版论要》，再见于《病能论》，三见于《疏五过论》，四见于《方盛衰论》。什么叫奇恒？《素问·病能论》中解释说：“奇恒者，言奇病也。”“所谓奇者，使奇病不得以四时死也；恒者，得以四时死也。”顾观光又解释说：“奇恒，谓异于常也。疑《素问·奇病论》即奇恒书之仅存者。《史记》述仓公所授书，有《奇咳术》。疑“奇咳”即“奇恒”。“咳，应作倅，许氏《说文解字》云：“奇倅，非常也。”因此，“奇倅”与“奇恒”，实为同义词，说明《奇倅术》与《奇恒》，有系同一书的可能性。

（二）《九针》

《九针》在《素问》中凡三见。一见于《三部九候论》，文曰：“黄帝问曰：余闻《九针》于夫子，众多博大，不可胜数。”再见于《八正神明论》，文曰：“《三部九候》为之原，《九针》之论不必存。”三见于《离合真邪论》，文曰：“余闻九针九篇，夫子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篇，余尽通其意矣。”前言“众多博大，不可胜数”，这里又说“九九八十一篇”，看来《九针》的内容是不少的。

（三）《针经》

《针经》见于《素问·八正神明论》，文曰：“帝曰：愿闻法往古者。岐伯曰：法往古者，先知《针经》也。”张介宾解释说：“此云《针经》为古法，可见是书之传，其来最远，似犹有出轩岐之前者。”我在前第二讲中曾谈到，《灵枢》、《针经》在流传的过程中，曾经一书而二名，是否即此《针经》，尚未敢必，但观其以“古法”称之，其流传之久远，似无疑义。

（四）《热论》

《热论》出《素问·评热病论》，文曰：“且夫《热论》曰：汗出而脉尚躁盛者死。”王冰注云：“《热论》谓上古《热论》也。”而本篇又名

《评热病论》，又引用了《热论》的文句，似乎旨在发挥《热论》中之精义者。

（五）《上经》、《下经》、《阴阳》、《从容》

《上经》、《下经》、《阴阳》、《从容》这四部文献，见于《素问·阴阳类论》，文曰：“却念《上、下经》、《阴阳》、《从容》。”

《上经》在《素问》中凡四见。一见于《病能论》，文曰：“《上经》者，言气之通天也。”再见于《气交变大论》，文曰：“《上经》曰：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三见于《疏五过论》，四见于《阴阳类论》，这两论仅提到《上经》之名而已。若据《病能论》及《气交变大论》所言。今《素问》中《生气通天论》的内容，颇与之接近。

《下经》在《素问》中凡五见。一见于《逆调论》，文曰：“《下经》曰：胃不和则卧不安。”再见于《痿论》，文曰：“《下经》曰：筋痿者，生于肝，使内也。”“《下经》曰：肉痿者，得之湿地也。”“《下经》曰：骨痿者，生于大热也。”三见于《病能论》，文曰：“《下经》者，言病之变化也。”四见于《疏五过论》，五见于《阴阳类论》，这两论仅提及《下经》之名而已。据前三论所言，《下经》所述为有关病症学或病理学的内容。如其谓“胃不和卧不安”，以及对筋、肉、骨诸痿的分析，今天用于临床，都有指导意义。

《阴阳》在《素问》中凡四见，一见于《病能论》，文曰：“肺气盛则脉大，脉大则不得偃卧，论在《奇恒》、《阴阳》中。”王冰注云：“《奇恒》、《阴阳》，上古经篇名，世本缺。”再见于《著至教论》，文曰：“帝曰：子不闻《阴阳》传乎！”三见于《阴阳类论》，文曰：“却念，《上、下经》、《阴阳》、《从容》……决以度，察以心，合之《阴阳》之论。”四见于《解精微论》，文曰：“行教以经论，《从容》、《形法》、《阴阳》。”顾名思义，《阴阳》当是阐发阴阳学说的古文献，从《素问》以阴阳名篇诸论的内容来看，均可以测知。

《从容》如上所述，《素问·阴阳类论》、《素问·解精微论》都提到了《从容》这个文献。特别是《素问·阴阳类论》中说：“颂得《从

容》之道，以合《从容》。”张介宾为之解释云：“颂，诵同。《从容》之道可诵，其为古经篇名可知。如《示从容论》之类是也。以合《从容》，合其法也。”今《素问》的《示从容论》，主要是讲通过脉症的观察，分析病变机制。果尔，则《从容》当属于辨证一类的典籍。

(六)《脉经》、《脉法》、《脉要》

《脉经》见于《素问·示从容论》，文曰：“雷公曰：臣请诵《脉经·上下篇》甚众多矣，别异比类，犹未能以十全，又安足以明之？”张介宾注云：“古有《脉经》，意即《脉要精微》、《平人氣象》等论之义。”

《脉法》见于《素问·五运行大论》，文曰：“《脉法》曰：天地之变，无以脉诊。”

《脉要》见于《素问·至真要大论》，文曰：“《脉要》曰：春不沉，夏不弦，冬不涩，秋不数，是谓四塞。沉甚曰病，弦甚曰病，涩甚曰病，数甚曰病，参见曰病，复见曰病，未去而去曰病，去而不去曰病，反者死。”

从以上三种脉书的存在，说明古代对“脉学”的总结由来已久，《素问》言“脉学”内容之丰富，亦不难理解了。

(七)《形法》

《形法》如上所述，出于《素问·解精微论》，从论中所言悲哀喜怒、观神察色的内容来看，或即古代观察“形”、“色”之法的文献。

(八)《本病》

《本病》见于《素问·痿论》，文曰：“故《本病》曰：大经空虚，发为肌痹，传为脉痿。”王冰注：“《本病》，古经论篇名也。”今《素问》二十一卷，犹存“本病论篇第七十三”的篇目，并旁注“亡”。说详见前第二讲有关《素问遗篇》中。

(九)《阴阳十二官相使》

《阴阳十二官相使》见于《素问·奇病论》，文曰：“夫肝者，中之将也，取决于胆，咽为之使。此人者数谋虑不决，故胆虚气上溢，而口为之苦，治之以胆募俞，治在《阴阳十二官相使》中。”王冰注云：“言治法具于彼篇，今经已亡。”所言治法，是指胆虚气上溢而口苦，

取胆经的募俞以为之治，则知所言阴阳指脏腑，十二官即指脏腑所主诸窍。据此，其内容已可以知其大略。

(十)《金匱》

《金匱》见于《素问·病能论》，文曰：“《金匱》者，决死生也。”可能似《内照法》一类的文献，但无从考。

(十一)《太始天元册文》

《太始天元册文》见于《素问·天元纪大论》，文曰：“臣积考《太始天元册文》曰：太虚寥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五运终天，布气真灵，揔统坤元，九星悬朗，七曜周旋，曰阴曰阳，曰柔曰刚，幽显既位，寒暑弛张，生生化化，品物咸章。”王冰注云：“《天元册》，所以记天真元气运行之纪也。此太古占候灵文，已镌诸玉版，命名册文。太古灵文，故命曰《太始天元册》也。”应属于古代天象学的文献。

(十二)《大要》

《大要》在《素问》中凡两见。一见于《六元正纪大论》，文曰：“《大要》曰：甚纪五分，微纪七分，其差可见。”再见于《至真要大论》，论中凡五次引用：“《大要》曰：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臣四，偶之制也；君二臣三，奇之制也；君二臣六，偶之制也。”“《大要》曰：粗工嘻嘻，以为可知，言热未已，寒病复始，同气异形，迷诊乱经。”“《大要》曰：彼春之暖，为夏之暑，彼秋之忿，为冬之怒，谨按四维，斥候皆归，其终可见，其始可知。”“《大要》曰：少阳之主，先甘后咸；阳明之主，先辛后酸；太阳之主，先咸后苦；厥阴之主，先酸后辛；少阴之主，先甘后咸；太阴之主，先苦后甘；佐以所利，资以所生，是谓得气。”“《大要》曰：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必先五胜，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以上或言方制，或言诊法，或言四时，或言六气，或言病机，看来《大要》所具的内容，是极其广泛的。

(十三)《刺法》

《刺法》在《素问》中凡四见。一见于《评热病论》，再见于《腹中论》，均言：“论在《刺法》中。”王冰均注云：“今经亡。”三见于《奇病

论》，略谓：“《刺法》曰：无损不足，益有余，以成其疹，然后调之。”四见于《调经论》，文曰：“《刺法》言：有余泻之，不足补之。”《刺法》在《灵枢》中凡两见。一见于《官针第七》，文曰：“《刺法》曰：始刺浅之，以逐邪气而来血气；后刺深之，以致阴气之邪；最后刺极深之，以下谷气。”再见于《逆顺第五十五》，文曰：“《刺法》曰：无刺焯焯之热，无刺漉漉之汗，无刺浑浑之脉，无刺病与脉相逆者。”

以上二十一种远古文献，均见于《素问》，仅《刺法》兼见于《灵枢》。说明《灵枢》成书较早，无从引用上述文献，《素问》成书略晚，便得以充分引用上述文献。正因为《素问》晚出，所以它还引用了《灵枢》的内容。如《疟论》云：“故《经》言曰：方其盛时必毁，因其衰也，事必大昌。”而《灵枢·逆顺》有曰：“方其盛也，勿敢毁伤，刺其已衰，事必大昌。”则《疟论》所称之《经》，即《灵枢经》也。又《素问·至真要大论》云：“《经》言：盛者泻之，虚者补之。”而《灵枢·大惑论》便有“盛者泻之，虚者补之”之语，可见《素问·至真要大论》所称之《经》，仍然是《灵枢经》。《素问·至真要大论》又云：“《论》言：人迎与寸口相应，若引绳小大齐等，命曰平。”而《灵枢·禁服》有曰：“寸口主中，人迎主外，两者相应，俱往俱来，若引绳大小齐等，春夏人迎微大，秋冬寸口微大，如是者名曰平人。”则《素问·至真要大论》所引，实《灵枢》之节文耳。《素问》既一而再地引用《灵枢》之文，谓其后出，自无疑义矣。

又《素问》中还有多处引用远古经论，尚不知其出处的，如《素问·离合真邪论》文曰：“《经》言：气之盛衰，左右倾移，以上调下，以左调右，有余不足，补泻于荣输。”《素问·调经论》文曰：“《经》言：阳虚则外寒，阴虚则内热，阳盛则外热，阴盛则内寒。”《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文曰：“《论》言：热无犯热，寒无犯寒。”《素问·至真要大论》文曰：“《论》言：治寒以热，治热以寒。”《素问·解精微论》文曰：“且子独不诵不念夫《经》言乎：厥则目无所见。”

以上说明《黄帝内经》引用的远古文献是非常丰富的，特别是《素问》虽由代远年湮，仅存吉光片羽，正因为如此，所以弥觉其太可

珍惜了。



《素问》、《灵枢》的书名和卷篇

(一)《素问》、《灵枢》的书名

《素问》之名,最早见于公元三世纪初期张仲景的《伤寒论·自序》,他说:“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胕》、《药录》。”从此以后,直到现在,一千七百多年来,这个名称都没有改变。为什么要叫《素问》呢?林亿等人的《新校正》说:“所以名《素问》之义,全元起有说云:‘素者,本也;问者,黄帝问岐伯也。方陈性情之源,五行之本,故曰《素问》。’元起虽有此解,义未甚明。按《干凿度》云:‘夫有形生于无形,故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形质具,而苛瘵由是萌生。故黄帝问此太素,质之始也。《素问》之名,义或由此。”林亿等人认为,具备了气、形、质的人体,有生以来,便不免有种种疾病发生,故为“问答”以发明之。杨上善早就是这样理解的,所以把自己整理的《黄帝内经》,迳称为《黄帝内经太素》。“素”作“质”解,这一意义是可取的。早在《管子》的《水地篇》也说:“素也者,五色之质也。”用现在的语言来理解,《素问》是研究人的质体、生理、病理等内容的文献,可以说《素问》的含义是唯物的。

《灵枢》共有三名,最早叫《针经》,《灵枢》第一篇《九针十二原》中说“先立《针经》”无异乎就是它的自我介绍。次又叫《九卷》,即《伤寒论》仲景自序所云。到了晋代,皇甫谧又叫《针经》,他在《甲乙经·自序》说:“按《七略》、《艺文志》,《黄帝内经》十八卷,今有《针经》九卷,《素问》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内经》也。”到了唐代,王冰才开始叫“《灵枢》”。王冰注《素问》,在两处都引用自《灵枢》“经脉为里,支而横者为络,络之别者为孙络”几句话,在《三部九候

论》引用时称“《灵枢》曰”；在《素问·调经论》引用时称“《针经》曰”。于是《新校正》云：“详此注引《针经》曰，与《三部九候论》注两引之，在彼云《灵枢》，而此曰《针经》。则王氏之意，指《灵枢》为《针经》也。按今《素问》注中引《针经》者，多《灵枢》之文，但以《灵枢》今不全，故未得尽知也。”（见《素问·调经论》“神气乃平”句注）

《灵枢》名称的演变，大略如此。至其命名之义，因其书仅有九卷，故称之为《九卷》。书中的主要内容，是研究针刺的，故又称之曰《针经》。这两个名称都比较简单而易于理解。至于为什么要叫《灵枢》，马蒔的解释是：“《灵枢》者，正以枢为门户，阖辟所系，而灵乃至神至元之称，此书之切，何以异是。”（《灵枢注证发微》卷首）张介宾解释说：“神灵之枢要，是谓《灵枢》。”（《类经》一卷“类经名义”）王九达说：“灵乃至神至玄之称，枢为门户阖辟所系。《生气通天论》‘欲若（今本作如）运枢，’枢，天枢也。天运于上，枢机无一息之停，人身若天之运枢，所谓‘守神守机’是也。其初意在于舍药而用针，故揭空中之机以示人，空者灵，枢者机也。既得其枢，则经度营卫，变化在我，何灵如之。”（《黄帝内经素问灵枢合类》）

以上诸家的解释，读之仍令人不得其要领，便引起日人丹波元胤的鄙视。他说：“今考《道藏》中有《玉枢》、《神枢》、《灵轴》等之经，而又收入是经，则《灵枢》之称，意出于羽流者欤！”丹波氏虽持鄙视态度，而于《灵枢》实际的含义，仍不得其解。

据我看来，《灵枢》既名《针经》，而其主要内容亦确是研究经脉、俞穴、营卫气运行以及各种刺法的，因此它的命名应该是从针法方面来考虑的多，这比较合乎情理。诸家的解释，除丹波元胤外，都抓住了这点，并都以《灵枢·九针十二原》所说，为其解释的依据。如：“小针之要，易陈而难入，粗守形，上守神，神乎神，客在门，未睹其疾，恶知其原。刺之微在速迟，粗守关，上守机，机之动，不离其空，空中之机，清静而微，其来不可逢，其往不可追。知机之道者，不可挂以发，不知机道，扣之不发，知其往来，要与之期，粗之暗乎，妙哉工独有之。往者为逆，来者为顺，明知逆顺，正行无问。逆而夺

之,恶得无虚,追而济之,恶得无实,迎之随之,以意和之,针道毕矣。”这一段讲的是针法的枢机和机要,临床用针,手法能娴熟到这样得心应手的程度,确乎应该是个高明的针法大家,而且把针刺的枢机亦描写得最惟妙惟肖。诸家据以解释《灵枢》的枢,也是正确的。不足的是他们解释得并不透彻,反而神秘化了,“灵枢”本来的取义,应该是:灵者,验也,针刺的疗效,至为灵验,但必须得其刺法之枢机而后灵,故名之曰《灵枢》。

(二)《素问》、《灵枢》卷篇的演变

《素问》、《灵枢》两经的书名,大略如上所述。再谈谈两经有关篇卷的演变。《甲乙经》皇甫谧自序和《隋书·经籍志》都说《素问》是九卷,看来《素问》最早的卷数就是如此。全元起的注本,宋以后就亡佚了,但据宋臣林亿等的《新校正》所注,仍为九卷,兹将日人丹波元简据《新校正》所载全本的卷篇次第抄录于下。

卷第一(凡七篇):平人气象论、决死生篇(今为“三部九候论”)、藏气法时论、宣明五气、经合论(今为“离合真邪论”)、调经论、四时刺逆从论(从“春气在经脉”起至篇末,余在第六卷)。

卷第二(凡十一篇):移精变气论、玉版论要、诊要经终论、八正神明论、真邪论(重出)、标本病传论、皮部论(篇末有“经络论”)、骨空论(自“灸寒热之法”以下,在六卷“刺齐论”末)、气穴论、气府论、缪刺论。

卷第三(凡六篇):阴阳离合论、十二藏相使、六节藏象论、阴阳脉解、长刺节论、五藏举痛(今为“举痛论”)。

卷第四(凡八篇):生气通天论、金匱真言论、阴阳别论、经脉别论、通评虚实论、太阴阳明论、逆调论、痿论。

卷第五(凡十篇):五藏别论、汤液醪醴论、热论、刺热论、评热病论、疟论、腹中论、厥论、病能论、奇病论。

卷第六(凡十篇):脉要精微论、玉机真藏论、宝命全形论、刺疟论、刺腰痛论、刺齐论(今“刺要论”出于此篇)、刺禁论、刺志论、针解、四时刺逆从论(仅“厥阴有余”至“筋急目痛”一段)。

卷第七(缺)

卷第八(凡七篇):痹论、水热穴论、从容别白黑(今为“示从容论”)、论过失(今为“疏五过论”)、方论得失明箸(今为“征四失论”)、阴阳类论、方论解(今为“方盛衰论”)。

卷第九(凡九篇):上古天真论、四气调神大论、阴阳应象大论、五藏生成、异法方宜论、咳论、风论、大奇论、脉解。

以上凡八卷,六十八篇。全元起《素问训解》的卷目面貌如此,与今本大大不同,今本是由唐代王冰次注的,他在次注的时候,改编为二十四卷,篇目的次序亦大为更改了。现还存有元代胡氏“古林书堂”的刊本,又合并为十二卷。还有明代正统年(1436~1449)间刊的《道藏》本,又割裂成五十卷。所幸卷数虽然时分时合,而篇目的次第亦仍保持王冰之旧,没有任何变动。至于明清各注家的卷数也是或分或合,或多或少。

《灵枢》原本最早亦只有九卷,所以曾一度竟把《灵枢》叫作《九卷》,《伤寒论》张仲景自序就是这样称谓的。为什么要叫它《九卷》呢?日人丹波元胤说:“先子曰:《灵枢》单称《九卷》者,对《素问》八卷而言之。盖东汉以降,《素问》既亡“第七”一卷,不然则《素问》亦当称九卷尔。”(《医籍考·医经五》)

到了南宋时候,才由史崧改编为二十四卷,他在自序中曾说:“家藏旧本《灵枢》九卷,共八十一篇,增修音释,附于卷末,勒为二十四卷,庶使好生之人,开卷易明,了无差别。”史崧之所以要把《灵枢》改为二十四卷,是针对王冰的改订《素问》而来的。因以前《素问》只九卷,《灵枢》亦只九卷;现《素问》经王冰改为二十四卷了,势必将《灵枢》亦改为二十四卷,才与之相称,基本上没有其他的意义。

《灵枢》的篇目,在《针经》和《灵枢》两种本子并存的时候,据《中兴馆阁书目》的记载,《针经》的首篇是《九针十二原》,而《灵枢》的首篇是《精气》。遗憾的是,现存的《灵枢》没有经宋臣等校过,以致篇目详细的异同,不得而知。到了元代胡氏“古林书堂”刊行《灵枢》的时候,又合并为十二卷,因它刊的《素问》也是十二卷,

这样才能两书相称。明刊的《道藏》本，又改订为二十三卷，仅及《素问》卷数的一半，可能是因为《素问》有注，文字量多，《灵枢》无注，文字量少的缘故。

总之，王冰改编的二十四卷本《素问》，是现存的最早刊本，是经过宋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高宝衡、孙奇、林亿等校正，孙兆重改误刊行的，所以它的书名全称为“《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史崧改编的二十四卷本《灵枢》，也是现存最早的刊本，它的书名全称是“《黄帝内经灵枢经》”。



校勘《黄帝内经》诸家

（一）校勘对学习研究《黄帝内经》的意义

汉唐以前的书籍，主要用材是“竹简”，或用“帛”，或者刻在木板上等。以此方式流传，都很不容易保存，代远年湮，必然要发生错落遗佚、涣漫剥蚀诸种现象。兼以古今语言文字的不断变迁，时间的距离愈远，其间的变化愈大。是以阅读古代书籍，往往要通过仔细地校勘，才能真正读懂和正确理解，因而“校勘”成为阅读古书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正如张舜徽所说：“古书流传日久，讹舛滋多，或误夺一字，而事实全乖，或偶衍一文，而意谊尽失，苟非善读书者，据他书订正之，则无以复古人之旧，此校勘之役所以不可缓也。”（见《广校雠略·书籍必须校勘论》）

《黄帝内经》在两千多年中，流传的情况怎样呢？单从《素问》来说，在唐代就已经错乱不堪了，故王冰的序文说：“世本纰缪，篇目重叠，前后不伦，文义悬隔，施行不易，披会亦难，岁月既淹，袭以成弊。或一篇重出，而别立二名；或两论并吞，而都为一目。或问答未已，别树篇题；或脱简不书，而云世阙。重《经合》而冠《针服》，并《方宜》而为《咳篇》，隔《虚实》而为《逆从》，合《经络》而为《论要》。节《皮部》为《经络》，退《至教》以先针。诸如此流，不可胜数。”《素

问》的残缺错乱,到了这样的程度,可算是严重的了。我们今天能见到这样较为完整的《素问》,首先是王冰下了很大的校勘工夫,整理出来的。所以他在序文中又说:“其中简脱文断,义不相接者,搜求经论所有,迁移以补其处。篇目坠缺,指事不明者,量其意趣,加字以昭其义。篇论吞并,义不相涉,阙漏名目者,区分事类,别目以冠篇首。君臣请问,礼仪乖失者,考校尊卑,增益以光其意。错简碎文,前后重迭者,详其指趣,削去繁杂,以存其要……凡所加字,皆朱书其文,使今古必分,字不杂糅。”

校勘之学,首先要具备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小学”的基本功,然后博览群籍,才能堪言校勘,正如孙诒让所说:“综举厥善,大抵以旧刊精校为据依,而究其微旨,通其大例,精思博考,不参成见,其诂正文字讹舛,或求之于本书,或旁证之他籍,及援引之类书,而以声类通转为之铃键,故能发疑正读,奄若合符。”(见《札迻·序》)孙诒让的要求,固然是高标准,但不如此,便达不到校勘之目的,便不能认识古书之本来面貌。兹举周学海校《灵枢·热病》“男子如蛊,女子如怛”一例来说明之。

周氏云:“怛者,阻之讹也。《甲乙经》引此作‘阻’。《脉经》有‘肝中风者,令人嗜甘,如阻妇状。’是明明以‘阻’为妊娠之称矣。谓妊娠则经阻不下也。丹溪解为呕恶以阻饮食者谬矣。马注径作‘怛’解。考字书无‘怛’字,揣其注意,颇似‘怛’字之义,穿凿极矣。张隐庵起而正之,宜也。惜未见《甲乙经》耳。又见《太素》作‘姐’,尤非。”

周氏这段校文校得是比较精确的,首先从文字上识破“怛”为“阻”之讹(但周氏谓字书无“怛”字,不对。《广韵》、《集韵》、《韵会》等字书均有,并音将豫切),又取得《甲乙经》的旁证,特别是《脉经》“如阻妇状”一词,来证明“女子如阻”,证据尤为确切。虽然张志聪亦谓“‘怛’当作‘阻’”并早于周氏,但没有提出勘定的旁证,只能说理,却无依据。故在张志聪不能谓为校勘,而在学海则为较好的校勘。张介宾谓“‘怛’当作‘胎’”,已晓其义,而未能说其字。马

蒔谓“‘怛’当作‘疸’”，则甚无义矣。

由此看来，阅读古医书，具备一定的校勘知识，是很有用处的，如果毫不具有校勘常识，阅读古书的困难必然要多得多。可惜的是，向来注释《黄帝内经》诸家，鲜有精于校勘者，而不知医的学者，于《素问》、《灵枢》的校勘，反作出一定的成绩。其中最卓著者，约有下列诸家。

（二）林亿等的《新校正》

林亿等的《新校正》，即宋臣林亿等校《素问》时所作的校勘，今存于《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中。他们在校《素问》的序文里说：“臣等承乏典校，伏念旬岁，遂乃搜访中外，哀集众本，浸寻其义，正其讹舛，十得其三四，余不能具。窃谓未足以称明诏，副圣意，而又采汉唐书录古医经之存于世者，得数十家，叙而考正焉。贯穿错综，磅礴会通，或端本以寻支，或溯流而讨源，定其可知，次以旧目，正缪误者六千余字，增注义者二千余条，一言去取，必有稽考，舛文疑义，于是详明。”（《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宋臣《新校正》校的时间较早，校的条数亦较多，所勘定的质量亦较高，试举数例如下。

王冰释《素问·生气通天论》“高粱之变，足生大丁”云：“所以丁生于足者，四支为诸阳之本也。以其甚费于下，邪毒袭虚故尔。”《新校正》则谓：“丁生之处，不常于足，盖谓膏粱之变，饶生大丁，非偏著足也。”把“足”训为虚词，实较王注为优。

王冰又释同篇“味过于辛，筋脉沮弛，精神乃央”云：“沮，润也。弛，缓也。央，久也。辛性润泽，散养于筋，故令筋缓脉润，精神长久。何者？辛补肝也。”《新校正》则谓：“此论味过所伤，难作精神长久之解，‘央’乃‘殃’也，古文通用……盖古文简略，字多假借用者也。”《新校正》所训极是。

《素问·玉版论要》云：“阴阳反他，治在权衡相夺。”《新校正》谓：“按《阴阳应象大论》云‘阴阳反作’。”“他”字不可训，证以《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其为“作”字，毫无疑义。

《素问·诊要经终论》云：“甚者传气，间者环也。”王冰注云：

“辨疾气之间甚也，‘传’谓相传，‘环’谓循环也。相传则传所不胜，循环则周回于五气也。”《新校正》则谓：“按《太素》‘环也’作‘环已’。”“环已”即旋止之义，意思是说病甚者，得刺即流通其气而渐愈，若轻者，病旋已也。故《太素》之说甚是。

因此，我们学习《素问》，《新校正》是必须要阅读的。

(三) 胡澍的《素问校义》

胡澍《素问校义》书一卷，未成而逝，故仅存三十二条。澍精小学，故其校勘，法度谨严。例如：《素问》中有文曰：“病之形能也”、“乐恬憺之能”、“与其病能”、“及其病能”、“愿闻六经脉之厥状病能也”、“病能论”、“合之病能”、“此阴阳更胜之变，病之形能也”等等。澍案：“能，读为‘態’。‘病之形能也’者，病之形態也。《荀子·天论篇》：‘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形能亦形態（杨倞注，误以‘形’字绝句，‘能’属下读，高邮王先生《荀子杂志》已正之。）《楚辞·九章》：‘固，庸態也。’《论衡·累害篇》：‘態作能。’《汉书·司马相如列传》：‘君子之態。’《史记》徐广本‘態’作能（今本误作熊）。皆古人以‘能’为‘態’之证。（‘態’从心能，而以能为態。‘意’从心音，而《管子·内业篇》以音为意。‘志’从心之，而《墨子·天志篇》以之为志。其例同也，此三字盖皆以会意包谐声。）下文曰：‘是以圣人为无为之事，乐恬憺之能。’‘能’亦读为態，与事为韵。恬憺之能，即恬憺之態也。《五藏别论》曰：‘观其志意，与其病能。’（今本误作‘与其病也。’依《太素》订正，辨见本条）‘能’亦读为態，与意为韵，‘病能’即‘病態’也。《风论》曰：‘愿闻其诊，及其病能’，即‘及其病態’也。《厥论》曰：‘愿闻六经脉之厥状病能也。’‘厥状’与‘病能’并举，即厥状病態也。第四十八篇名《病能论》，即《病態论》也。《方盛衰论》曰：‘循尺滑涩寒温之意，视其大小，合之病能。’‘能’亦与意为韵，即‘合之病態’也。王于诸‘能’字，或无注，或批驳其说，均由不得其读。《释音》发音于本篇上文，‘能冬不能夏，曰奴代切，下形能同。’则又强不知以为知矣。”

又校《四气调神大论》“圣人之行，愚者佩之”句，澍案：“‘佩’读

为‘倍’。《说文》：‘倍，反也。’……《荀子·大略篇》：‘教而不称，师谓之倍。’杨倞注曰：‘倍者，反逆之名也，字或作‘偁’（见《坊记投壶》），作‘背’（经典通以‘背’为‘倍’），‘圣人行之，愚者倍之’，谓圣人行道，愚者倍道也。‘行’与‘倍’正相反，故下遂云：‘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从之则治，逆之则乱。’‘从’与‘逆’亦相反，‘从’即‘行’（《广雅》‘从’行也），‘逆’即‘倍’也（见上《荀子》注）。‘佩’与‘倍’，古同声而通用。《释名》曰：‘佩，倍也，’言其非一物有倍贰也，是古同声之证。《荀子·大略篇》：‘一佩易之’，注曰：‘佩或为倍’，是古通用之证。王注谓‘圣人心合于道，故勤而行之，愚者性守于迷，胡佩服而已。’此不得其解，而曲为之说。古人之文恒多假借，不求诸声音，而索之字画，宜其诘鞠为病矣。”

虽学识渊博，但校勘仍贵专才，如汉刘向总任校书时，亦分任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胡澍仅因多病而留心医方，竟能对《素问》作出如此精确的校勘，真是难能可贵，只以未能卒其志为憾。

（四）俞樾的《读书余录》

俞樾《读书余录》（《内经》之部），凡四十八条。俞氏治小学不摭商周彝器，为古训巨擘。如《素问·阴阳别论》文曰：“二阳之病，发心脾，有不得隐曲，女子不月。”王注曰：“隐曲，谓隐蔽委曲之事也。夫肠胃发病，心脾受之，心受之则血不流，脾受之则味不化。血不流故女子不月，味不化则男子少精，是以隐蔽委曲之事不能为也。”樾校谨按：“王氏此注，有四失焉。本文但言‘女子不月’，不言‘男子少精’，增益其文，其失一也。本文先言‘不得曲隐’，后言‘女子不月’，乃增出男子少精，而以不得隐曲，总承男女而言，使经文侧置，其失二也。‘女子不月’既著其文，又申以不得隐曲之言，而男子少精，必待注家补出，使经文详略失宜，其失三也。《上古天真论》曰：‘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泻。’是男子之精、女子月事，并由肾气，少精与不月，应是同病，乃以女子不月属之心，而以男子少精属之脾，其失四也。今按下文云：‘三阴

三阳俱搏，心腹满，发尽不是隐曲，五日死。’注曰：‘隐曲为便泻也。’然则，不得隐曲，谓不得便泻。王注前后不照，当以后注为长。‘便泻’谓之‘隐曲’，盖古语如此。襄十五年《左传》：‘师慧过宋朝，私焉。’杜注曰：‘私，小便，便泻谓之隐曲，犹小便谓之私矣。’‘不得隐曲’为一病，‘女子不月’为一病，二者不得并为一谈。‘不得隐曲’，从下注训为不得便泻，正与脾病相应矣。”

又如《素问·五藏生成》文曰：“凝于脉者为泣。”王注曰：“泣，为血行不利。”樾校谨按：“字书‘泣’字并无此义，‘泣’疑‘沍’字之误。《玉篇》水部：‘沍，胡故切，闭塞也。’‘沍’字右旁之‘互’，误而为‘立’，因改为‘立’，而成‘泣’字矣。上文云：‘是故多食盐，则脉凝泣而变色。’‘泣’亦‘沍’字之误。王氏不注于前，而注于后，或其作注时，此文‘沍’字犹未误，故以血行不利说之，正‘沍’字之义也。《汤液醪醴论》：‘营泣卫除。’《八正神明论》：‘人血凝泣。’‘泣’字并当作‘沍’。”

前者为古训，后者为说字，均勘定得确切不移，惜其仅限于《素问》，而又太少耳！

（五）孙诒让的《札迻》

孙诒让的《札迻》，凡卷十二。孙氏为有清三百年朴学之殿，《札迻》十二卷，皆其校讎古书，诂正文字的札记，卷第十一，即为校《素问》的札记，凡十三条。

其校《素问·阴阳别论》篇云：“‘三阳三阴发病，为偏枯痿易，四肢不举。’注云：‘易，谓变易常用，而痿弱无力也。又《大奇论》篇‘跛易偏枯’。注云：‘若血气变易为偏枯也。’按：易，并当读为‘施’。《汤液醪醴论》篇云：‘是气拒于内，而形施于外。’施，亦作‘弛’。《生气通天论》篇云：‘大筋栗短，小筋弛长，栗短为拘，弛长为痿。’又云：‘筋脉沮弛。’注云：‘弛缓也。’《痿论》篇云：‘宗筋弛纵。’《刺要论》篇云：‘肝动则春病热而筋弛。’《皮部论》篇云：‘热多则筋弛骨消。’盖痿跛之病，皆由筋骨解弛，故云：‘痿易’、‘跛易’，‘易’即‘弛’也。王如字释之，非经旨也。《毛诗·何人斯》篇：

‘我心易也。’《释文》：‘易，《韩诗》作施。’《尔雅·释诂》：‘弛，易也。’《释文》：‘弛本作施。’是‘易’、‘施’、‘弛’古通之证。”

又校《痹论》篇云：“‘凡痹之类，逢寒则虫，逢热则纵。’注云：‘虫，谓皮中如虫行。’《新校正》云：‘按《甲乙经》虫作急。’按：‘虫’当作‘痼’之借字。《说文·病部》云：‘痼，动病也，从病，虫省声，故古书痼或作虫。’段玉裁《说文》注：谓‘痼’即‘疼’字。《释名》云：‘疼，旱气疼疼然烦也。疼疼，即《诗·云汉》之虫虫是也。’盖痹逢寒则急切而疼疼然不安，则谓之‘痼’。《巢氏诸病源候论》云：‘凡痹之类，逢热则痒，逢寒则痛。’‘痛’与‘疼’义亦相近。王注训为‘虫行’，皇甫谧作‘急’，顾校从之，并非也。”

以上以“易”为“弛”，以“虫”为“痼”，均至切当，没有小学的修养，断难有此见识。

（六）顾观光的《素问校勘记》、《灵枢校勘记》

顾观光《素问校勘记》一卷，《灵枢校勘记》一卷。两书各刊于钱熙祚校刊守山阁本《素问》、《灵枢》之后，此为医人作校勘之首创，内容亦最丰富，不仅每篇都经校讎，抑且于王注及《新校正》均有所补直纠正，或引旧说，或出己见，均能期于精当，其精深度虽不能与胡澍、俞樾、孙诒让诸大家相比，而切实对勘，就医言医，亦大有助于学者。

（七）沈祖緜的《读素问臆断》、《读灵枢臆断》

沈祖緜的《读素问臆断》一卷，《读灵枢臆断》一卷。沈氏亦非医人，惟于小学、子学、经学等均修养有素，而于医学亦特别酷嗜，故于两个八十一篇，均已校勘过半。并亦有精校语。如校《素问·上古天真论》中“故能寿敝天地”一语云：“‘敝’字误，疑‘敌’字也。且与下文‘无有终时’义贯。《阴阳应象大论》：‘故寿命无穷，与天地终。’足为旁证。若云‘敝’，费解。或云‘敝’当为‘适’，古‘敌’、‘适’多假借，取形似则当为‘敌’也。”

又校《汤液醪醴论》中“去宛陈莖”句云：“此句亦倒，当作‘去苑莖陈’。《说文》：‘莖，斩刍也’。去重相对为文，苑陈亦相对为文。

《针解》云：‘菟陈则除之者，出恶血也。’菟即宛字，古通，亦菟陈相对，是其明证。”

《读素问臆断》，现尚为稿本，未能刊行，而《读灵枢臆断》，于抗日时期，已佚于邮，殊为可惜。

(八) 冯承熙的《校余偶识》

冯承熙的《校余偶识》一卷。约九十余条，载于黄元御《素问悬解》后。多引《新校正》及王冰语，间出以己意，虽无创新，亦可参考。

(九) 江有诰的《先秦韵读》

江有诰的《先秦韵读》(《素问》、《灵枢》之部)。该文献在《江氏音学十书》中，计《素问》二十三篇，五十二段。《灵枢》二十一篇，四十四段，概从韵语的角度，校其句读和文字的讹误。盖先秦之文，往往流露其天然的韵语，顾亭林称之为“化工”之文。《素问》、《灵枢》毫不例外，杂出不少有韵之文。如《灵枢·刺节真邪》篇：“凡刺小邪曰以大，补其不足乃无害，视其所在迎之界，远近尽至(其)不得外，侵而行之乃自费。”《日知录》誉为这是七言诗之始。正因为《素问》、《灵枢》文献为有韵之文，如有失韵之处，并知其有讹误。例如《素问·上古天真论》云：“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于神俱。”俞樾校云：“本作‘食饮有节，起居有度’，‘度’与‘数’为韵，今作‘有常’，则失其韵矣。”像这类的例子是很多的，因此，从音韵角度来校勘《素问》、《灵枢》，亦为重要途径之一。

(十) 于鬯的《香草续校书》

于鬯的《香草续校书》二卷凡百另三条。于氏著有《香草校书》六十卷，是校勘经部的著作。《香草续校书》二十二卷，是校勘子史部的著作。《黄帝内经素问》属于子部，故及之。于鬯曾师事张文虎、钟文蒸、王先谦诸氏，治训诂学颇精，故所校书，颇见卓见。

如校云：“《气交变大论》‘反胁痛’。‘反’，亦病名也，即《至真要大论》所谓‘诸转反戾’是也。彼王注云：‘反戾，转筋也。’盖筋转

谓之反戾，亦单曰反。‘反、胁痛’者，即转筋与胁痛二病。注家多误作一病解，则‘反胁’二字不可通。王注又倒作‘胁反’二字仍不可通。下文云：‘病反，谵妄’，谓病转筋与谵妄也。又云：‘反，下甚’，谓转筋与下甚也。又云：‘病反、腹满。’谓病转筋与腹满也。又云：‘病反，暴痛。’谓病转筋与暴痛也。不知‘反’之为病名，而连下读，诸文悉不可通矣。”

又校云：“《生气通天论》‘因于暑，汗烦则喘喝’，‘汗’字当衍。下文云：‘汗出而散’，则因于暑者，正取于汗，何得云‘汗烦则喘喝’乎？盖即涉彼而衍也。且‘汗烦’二字本无义。如王注云：‘病因于暑，则当汗泄，不为发表，邪热内攻，中外俱热，故烦躁喘喝，大呵而出其声。’则又读‘汗’一字句，与下文义且病复矣，抑无此文法也。‘烦则喘喝’与下句‘静则多言’，句各四字，文体整齐，读‘汗’一字句，不如径删‘汗’字直捷。”

又校云：“《阴阳应象大论》‘故邪风之至，疾如风雨’，既言邪风，又言疾如风，必不可通。据上下诸言气，不言风，且上文云：‘风气通于肝’，则‘风’亦‘气’之一。言‘风’不如言‘气’之赅矣。此‘邪风’当作‘邪气’，盖即涉‘疾如风’之‘风’字误。‘气’为‘风’，故邪气之至，疾如风雨，句始有义。下文云：‘故天之邪气，感则害人五藏。’彼‘邪气’正承此‘邪气’而言，则此之当作‘邪气’，不当作‘邪风’，明矣。”

又校云：“《上古天真论》‘醉以入房’，‘醉以’疑作‘以醉’，‘以醉入房’，与上文‘以酒为浆’、‘以妄为常’，下文‘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五‘以’字冠句首，文法一律，倒作‘醉以’，则失例矣。《腹中论》及《灵枢·邪气藏府病形》，并有‘若醉入房’语，则‘醉入房’三字连文，正有可证。”

以上四例，一释义，一衍文，一正误，一乙转，均甚确切有据，而非臆说者之可比。

（十一）日本校勘诸家

此外，日人度会常珍的《校讹》，丹波元简的《素问识》、《灵枢

识》，丹波元坚的《素问绍识》，所辑诸家有关校勘部分，亦甚有可取者。



注解《黄帝内经》诸家

注《黄帝内经》最早的，当推梁全元起所注的《黄帝素问》八卷，又叫《素问训解》。宋朝时此书还存在，以后便散失了。现从宋臣林亿等所校订的《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中，还可以见到少数全氏的注解。如：《素问·生气通天论》中“风客淫气，精乃亡，邪伤肝也”句下，《新校正》云：“按全元起云：‘淫气者，阴阳之乱气，因其相乱而风客之，则伤精，伤精则邪入于肝也’。”又如：《素问·热论》中“三阳经络皆受其病，而未入于藏者，故可汗而已”句下，《新校正》云：“按全元起云：‘藏作府’。元起注云：‘伤寒之病，始入于皮肤之腠理，渐胜于诸阳，而未入府，故须汗发其寒热而散之’。”前者把“淫气”解释为内在的因素，“风客”解释为外在的条件，这是合乎病变机制的。后者先校正“藏”为“府”之讹，才符合三阳经的受病，即云：“可汗而已。”邪尚在阳经表分，这是合乎辨证论治原则的。遗憾的是，像这类全氏的残缺注文，亦不可多得了。

注解《黄帝内经》现尚存较完整的注本，可分两类。一是单注《素问》诸家，如：王冰《素问释文》二十四卷，吴昆《素问吴注》二十四卷，高世栻《素问直解》九卷，张琦《素问释义》一卷。二是全注《素问》、《灵枢》诸家，如：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三十卷，马蒔《素问注证发微》九卷，马蒔《灵枢注证发微》九卷，张介宾《类经》三十二卷，张志聪《素问集注》九卷、《灵枢集注》九卷。现介绍如下。

（一）单注《素问》诸家

1. 王冰和《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

《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中保留了王冰对《素问》的全部注文，王冰对《素问》卷篇的整理，已如前述，而于注解中的发挥，亦有

许多突出的地方。如阐发《素问·至真要大论》“微者逆之，甚者从之”的制方大义说：“夫病之微小者，犹人火也，遇草而炳，得木而燔，可以湿伏，可以水灭，故逆其性气以折之、攻之。病之大甚者，犹龙火也，得湿而焰，遇水而燔；不知其性，以水湿折之，适足以光焰诣天，物穷方止矣；识其性者，反常之理，以火逐之，则燔灼自消，焰火扑灭。”这种“以寒治热”和“引火归原”的理论，在临床上是有极有指导意义的。王冰在同一篇中阐述“诸寒之而热者取之阴，热之而寒者取之阳，所谓求其属也”的理论时说：“言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壮水之主，以制阳光，故曰求其属。”对阳虚与阴虚两种不同的病变，采取“益火”与“壮水”两种不同的治疗方法，用于指导疾病的治疗，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2. 吴昆的《素问吴注》

吴昆的《素问吴注》，是以王冰的二十四卷本为底本，由于他的临床经验较丰富，对《素问》所言生理、病机、脉法等，有较深入的理解。如注《素问·灵兰秘典论》中“三焦者，决渎之官”说：“决，开也；渎，水道也。上焦不治，水溢高原；中焦不治，水停中脘；下焦不治，水畜膀胱。故三焦气治，则为开决渎之官，水道无泛溢停畜之患矣。”像这样结合临床所见病变，来说明“三焦决渎”的生理，便不觉空泛，而有其实际意义。又如《素问·五藏别论》文曰：“五藏六腑之气味，皆出于胃，变见于气口。”吴昆进而发挥说：“五脏六腑之气味，皆出于胃，熏蒸于肺，肺得诸脏腑之气，转输于经，故变见于寸口。”五脏六腑之气味，始则五味入口藏于胃，继则由脾气转输气味，皆出于胃，循经脉而变见气口。吴氏之说，与传统的概念是符合的，关于切诊寸口动脉，观察脏腑病机的问题，他的解释很到位。再如《素问·五藏生成》文曰：“诊病之始，五决为纪，欲知其始，先建其母。”王冰以“母”为应时旺气，张介宾以“母”指病因，马蒔以“母”指为五脏相乘之气，高世栻谓“母”为病本，揆之临证，都不尽合。惟吴氏云：“始，得病之原也；建，立也。母，应时胃气也。如春脉微弦，夏脉微钩，长夏脉微稊，秋脉微毛，冬脉微石，谓之中和而有胃气。土

为万物之母,故谓之母也。若弦甚,则知其病始于肝;钩甚,则知其病始于心;奭甚,则知其病始于脾;毛甚,则知其病始于肺;石甚,则知其病始于肾。故曰,欲知其始,先建其母。”把“母”解释为“胃气”,是符合临床经验的。汪昂评价说:“《素问吴注》间有阐发,补前注所未备。”这话并未过誉。吴昆对诊切五脏生死脉的体会既有深度,又有指导临床的价值。

3. 高世栻的《素问直解》

高世栻的《素问直解》是继张志聪《集注》之后而成书的,他认为“隐庵集注,义意艰深,其失也晦”。高氏的注解,确实解得明白晓畅。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文曰:“喜怒伤气,寒暑伤形,暴怒伤阴,暴喜伤阳。”其注云:“人之志意起于内,故喜怒伤气;天之邪气起于外,故寒暑伤形。举喜怒而悲忧恐在其中,举寒暑而燥湿风在其中。在天则寒为阴,暑为阳;在人则怒为阴,喜为阳。故卒暴而怒,则伤吾身之阴气,卒暴而喜,则伤吾身之阳气。”发挥无多,却能大畅厥旨,这是高氏作注的特色。

4. 张琦的《素问释义》

张琦的《素问释义》本平凡无它可述,惟亦有两大特点,足供必要时参考。首先是:书中所注,多采用黄元御《素灵微蕴》、章合节《素问阙疑》两家之说,而黄书和章书都流行较少,特别是《素问阙疑》,极不易覩,可于《素问释义》中求之。其次是:林亿《新校正》关于篇卷变迁的校语,基本上都采用了。至于他的注语,亦时有发挥,如注《素问·六节藏象论》“关格之脉羸”句云:“盖‘关格’虽有内外之不同,而总为阴盛而病阳。外格则阳浮,内关则阳陷,非阳盛而关阴于外之说也。绎越人、仲景、《甲乙经》之义,则得之矣。”“阴盛而病阳”一句,抓住于关格病成因的关键。

(二)全注《素问》、《灵枢》诸家

1. 杨上善的《太素》

杨上善的《太素》,实为《素问》、《灵枢》的混合改编本,其改编的方法,容后再谈。至其所注,黄以周氏评价说:“其为注,依经立

训,亦不逞私见,则其有胜于王氏次注者,概可知矣。且《太素》所编之文,为唐以前之旧本,可以校正今之《素问》、《灵枢》者,难覩缕述。《素问》、《灵枢》多韵语,今本之谐于韵者,读《太素》无不叶,此可见《太素》之文之古。杨氏之深于训诂,于通假已久之字,以借义为释,其字之罕见者,据《说文》本义,以明此经之通借。其阐发经意,足以补正次注者亦甚多。不仅如《新校正》所引皇甫氏《甲乙经》并《素问》、《灵枢》、《针经》为一书。王氏好言五运六气,又并《阴阳大论》于《素问》中,杨氏好言《明堂》、《针经》而别注之,不并入《太素》,此亦其体例之善,识见之高者。”(《做季文钞·旧钞太素经校本叙》)

注《素问》者,始于全元起,注《灵枢》者,实始于杨上善,可惜后来马蒔、张介宾、张志聪注《灵枢》诸家,均未及得见《太素》,今日在我国之传本,是自日本影写的仁和寺宫御藏唐人卷子抄本所翻刻者。

2. 马蒔的两部《注证发微》

马蒔的两部《注证发微》,其注《素问》部分,不为人所称许,其注《灵枢》部分,以其素娴于针灸经脉,故所注较精。试举《灵枢·四时气》篇为例,篇中谓:“春取经”、“夏取盛经孙络”、“秋取经俞”、“冬取井荣”。马注说:“春取经之经,当作络,义见《素问·水热穴论》。春取络穴之血脉分肉间,如手太阴肺经‘列缺’为络之类。夏取盛经孙络者,‘盛经’如手阳明大肠经‘阳溪’为络之类。孙络者,即《脉度》所谓‘支而横者为络,络之别者为孙’也。秋取各经之俞穴,如手太阴肺经‘太渊’为俞之类。冬取井荣,取井以泻阴逆,则阴经当刺井穴,如手太阴肺经‘少商’为井之类,取荣以实阳气,则阳经当刺荣穴,如手阳明大肠经‘二间’为荣之类。”由于四时邪气侵犯人体各有深浅之不同,针刺选穴,便有井、荣、输、经、合之各殊,如果不是于针灸理论和经验并富的人,便不可能注到马蒔这样准确的程度。

又如《灵枢·经筋》篇文曰:“经筋之病,寒则反折筋急,热则筋弛纵不收,阴痿不用。阳急则反折,阴急则俛不伸。燔刺者,刺寒急也,热则筋纵不收,无用燔针。”马蒔注说:“寒急有阴阳之分,背为

阳,阳急则反折;腹为阴,阴急则俛不伸。故制为焠刺者,正为寒也。焠刺即燔针。”没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于阳急、阴急之分,便不能如此熟识。所以汪昂对《素问注证发微》颇多非议,而对《灵枢注证发微》则曰:“至明始有马玄台之注,其疏经络穴道,颇为详明,可谓有功于后学。虽其中间有出入,然以从来畏难之书,而能力开坛坫,以视《素问》注,则过之远矣。”

3. 张介宾的《类经》

张介宾的《类经》,除了将经文分类而外,对于《素问》、《灵枢》的注释,亦有在诸家之上者。如《素问·五藏生成》文曰:“此皆卫气之所留止。”自王冰注为“卫气满填,以行邪气,不得居止”后,诸家多从王义。独介宾另为之说曰:“凡此‘谿谷’之会,本皆卫气留止之所,若其为病,则亦邪气所容之处也。”王注以“留止”分正邪言,究于义不安,不如张注的言顺理从。又《素问·玉版论要》文曰:“脉孤为消气。”介宾注云:“脉孤者,孤阴、孤阳也。孤阳者,洪大之极,阴气必消;孤阴者,微弱之极,阳气必消,故‘脉孤为消气’也。”说理既透,最易使人从临证方面来体会。又《灵枢·九针十二原》文曰:“必在悬阳,及与两卫。”介宾注云:“悬,犹言举也。阳,神气也。凡刺之时,必先举神气为主,故曰‘悬阳’。两卫者,卫气在阳,肌表之卫也,脾气在阴,藏府之卫也。二者皆神气所居,不可伤犯,凡用针者,首宜顾此,故曰‘两卫’。”比起马注以‘阳’为‘扬’,张志聪以‘悬阳’为‘心’,于义都胜。又注《灵枢·九针十二原》中的“陷脉”云:“诸经孔穴,多在陷者之中,故凡欲去寒邪,须刺各经陷脉,则经气行而邪气出,乃所以取阳邪之在上者。”张志聪指“陷脉”为“额颅之脉,显陷于骨中”者,颇难以理解。还是张介宾注得明白晓畅,于此可见其一般。

4. 张志聪的两部《集注》

张志聪的两部《集注》,是他率其门人集体注释而成,是以名之。正因其集中多人的智慧,故所注的质量亦较高。如《素问·阴阳别论》文曰:“二阴一阳发病,善胀,心满,善气。”王冰理解“心满善气”

为“气畜于上故心满，下虚上盛，故气泄出。”这不符合《素问》的习惯用语；而吴昆、马蒔、张介宾不作解释。张志聪注云：“善气者，太息也。心系急，则气道约，故太息以伸出之。”心满之满，同闷（懣）。心闷不舒，时欲太息而伸舒之。这是临床常见的症状，本病当由心肾之气不能相交所致。又注同篇“所谓阳者，胃脘之阳也”说：“所谓二十五阳者，乃胃脘所生之阳气也。胃脘者，中焦之分，主化水谷之精气以资养五脏者也。四时五脏之脉，皆得微和之胃气，故为二十五阳也。”而王冰却把胃脘之阳，指为人迎之气，未免失之简率，而与中医学传统的候脉须候胃气之旨不符。又《灵枢·邪气藏府病形》文曰：“脾脉急甚为痙痲，微急为膈中，食饮入而还出，后涎沫。”马蒔认为这是脾气不下疏的去后涎沫，张注则谓：“脾不能游溢津液，上归于肺，四布于皮毛，故涎沫之从口出也。”据临床所见，仍以张说较胜。张志聪师弟对其所注《素问》、《灵枢》，是颇为自负的。他说：“以昼夜之悟思，印岐黄之精义，前人咳唾，概听勿袭；古论糟粕，悉所勿存。惟与同学高良，共深参究之秘；及门诸弟，时任校正之严。”对待古人的东西，取其精华，扬弃糟粕，又发挥其集体力量，共同创造，这一精神是很可取的。

以上注解《黄帝内经》诸家，无论其单注《素问》或全注《素问》、《灵枢》，均各有其独到之处，亦各有其不足的地方，如何吸取其所长，摒弃其所短，择善而从，这就要我们下一番研究功夫了。日人丹波元简的《素问识》、《灵枢识》，丹波元坚的《素问绍识》也就是对各个注家作了一番比较选择，而且还是作得较好的，足资借鉴。

七

分类研究《黄帝内经》诸家

《黄帝内经》的内容，既是祖国医学基础理论之所在，又是采取综合叙述的方式来表达的，几乎每一篇中都不是单纯地讨论某一个主题，而是牵涉到好几个不同的主题。因而便引起一些医家用分类

的方法,按其不同性质的内容,各以类分。正如汪昂所说:“《素问》、《灵枢》各八十一篇,其中病证脉候、脏腑经络、针灸方药,错见杂出,读之茫无津涯,难得其窾会。本集除针灸之法不录,余者分为九篇,以类相从,用便观览。”(《素问灵枢类纂约注·凡例》)这种“以类相从”进行分类研究的方法,即使用现在的眼光看来,也还是比较科学的。不过他们的思路各不相同,有三种不同的分法。

(一)兼收并蓄分类法

采用兼收并蓄分类方法研究《黄帝内经》的诸家,他们认为《黄帝内经》两个八十一篇:“言言金石,字字珠玑,竟不知孰可摘而孰可遗。”(《类经·自述》)虽然把每一篇都拆散了,但还是一字不遗地将所有内容全部保存下来,毫无选择地兼收并蓄,其中隋杨上善、明张介宾是其代表。

1. 杨上善的《黄帝内经太素》

杨上善的《黄帝内经太素》,将《素问》、《灵枢》各篇全部拆散,按其不同主题的内容,共分做十九大类,据其现存的卷第类目分列如下。

第一卷 (佚)

第二卷 摄生之二

一、顺养(《灵枢》:师传、九针论;《素问》:宣明五气、四气调神大论)

二、六气(《灵枢》:决气)

三、九气(《素问》:举痛论)

四、调食(《灵枢》:五味论、九针论;《素问》:藏气法时论)

五、寿限(《灵枢》:天年;《素问》:上古天真论)

第三卷 阴阳之一

一、阴阳大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二、调阴阳(《素问》:生气通天论)

三、阴阳杂说(《素问》:金匱真言论、痹论、阴阳别论)

第四卷 (佚)

第五卷 人合

- 一、(篇名佚)(《灵枢》:邪客)
- 二、阴阳合(《灵枢》:阴阳系日月、根结;《素问》:阴阳离合论)
- 三、四海合(《灵枢》:海论)
- 四、十二水(《灵枢》:经水)

第六卷 藏府之一

- 一、(篇名佚)(《灵枢》:本神)
- 二、五藏命分(《灵枢》:本藏)
- 三、藏府应候(《灵枢》:本藏)
- 四、藏府气液(《灵枢》:脉度、九针论;《素问》:五藏别论、太阴阳明论、玉机真藏论)

第七卷 (佚)

第八卷 经脉之一

- 一、(篇名佚)(《灵枢》:经脉)
- 二、经脉病解(《素问》:脉解)
- 三、阳明脉病(《素问》:阳明脉解)

第九卷 经脉之二

- 一、经脉正别(《灵枢》:经别)
- 二、经脉同异(《灵枢》:邪客、动输)
- 三、经脉别异(《灵枢》:经脉)
- 四、十五络脉(《灵枢》:经脉)
- 五、经脉皮部(《素问》:皮部论、经络论)

第十卷 经脉之三

- 一、督脉(《素问》:骨空论)
- 二、带脉(《灵枢》:经别;《素问》:痿论)
- 三、阴阳跷脉(《灵枢》:脉度)
- 四、任脉(《灵枢》:五音五味)
- 五、冲脉(《灵枢》:逆顺肥瘦)
- 六、阴阳维脉(《素问》:刺腰痛)

七、经脉标本(《灵枢》:卫气)

八、经脉根结(《灵枢》:根结)

第十一卷 输穴

一、本输(《灵枢》:本输)

二、变输(《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素问》·水热穴论)

三、府病合输(《灵枢》:邪气藏府病形)

四、气穴(《灵枢》:背腧;《素问》:气穴论、水热穴论)

五、气府(《灵枢》:气府)

六、骨气(《灵枢》:骨空)

第十二卷 营卫气

一、(篇名佚)(《灵枢》:营气、营卫生会)

二、营卫气行(《灵枢》:邪客、阴阳清浊、五乱)

三、营五十周(《灵枢》:五十营)

四、卫五十周(《灵枢》:卫气行)

第十三卷 身度

一、经筋(《灵枢》:经筋)

二、骨度(《灵枢》:骨度)

三、肠度(《灵枢》:肠胃)

四、脉度(《灵枢》:脉度)

第十四卷 诊候之一

一、(篇名佚)(《素问》:三部九候论)

二、四时脉形(《素问》:玉机真藏论)

三、真藏脉形(《素问》:玉机真藏论)

四、四时脉诊(《素问》:玉机真藏论、脉要精微论)

五、人迎脉口诊(《灵枢》:禁服、根结、终始、论疾诊尺;《素问》:五藏别论、病能论)

第十五卷 诊候之二

一、色脉诊(《素问》:移精变气论、五藏生成、玉版论要)

二、色脉尺诊(《灵枢》:邪气藏府病形)

三、尺诊(《灵枢》:论疾诊尺)

四、尺寸诊(《素问》:平人气象论)

五、五藏脉诊(《灵枢》:邪气藏府病形;《素问》:宣明五气、平人气象论、脉要精微论、大奇论)

第十六卷 诊候之三(我国本缺)

一、虚实脉诊(《素问》:玉机真藏论、通评虚实论、刺志论)

二、杂诊(《灵枢》:论疾诊尺;《素问》:脉要精微论、腹中论、病能论、四时刺逆从论)

三、脉论(《素问》:阴阳类论、示从容论、著至教论、经脉别论)

第十七卷 证候之一

(篇名佚)(《灵枢》:论疾诊尺;《素问》:五藏生成)

第十八卷 (佚)

第十九卷 设方

一、知古今(《素问》:汤液醪醴论)

二、知要道(《灵枢》:外揣)

三、知方地(《素问》:异法方宜论)

四、知形志所宜(《灵枢》九针论;《素问》:血气形志)

五、知祝由(《素问》:移精变气论)

六、知针石(《素问》:宝命全形论、针解、刺禁论、病能论)

七、知汤药(《素问》:汤液醪醴论)

八、知官能(《灵枢》:官能)

第二十卷 (佚)

第二十一卷 九针之一(我国本佚)

一、九针要道(《灵枢》:九针十二原)

二、九针要解(《灵枢》:小针解)

三、诸原所生(《灵枢·九针十二原》)

四、九针所象(《灵枢》:九针论、九针十二原)

第二十二卷 九针之二

一、刺法(《灵枢》:五禁、逆顺肥瘦、邪客、根结)

- 二、九针所主(《灵枢》:官针)
- 三、三刺(《灵枢》:官针、终始)
- 四、三变刺(《灵枢》:寿夭刚柔)
- 五、五刺(《灵枢》:官针)
- 六、五藏刺(《灵枢》:五邪)
- 七、五节刺(《灵枢》:刺节真邪)
- 八、五邪刺(《灵枢》:刺节真邪)
- 九、九刺(《灵枢》:官针)(我国本佚)
- 十、十二刺(《灵枢》:官针)(我国本佚)

第二十三卷 九针之三

- 一、量缪刺(《素问》:缪刺论)
- 二、量气刺(《灵枢》:行针)
- 三、量顺刺(《灵枢》:逆顺)
- 四、痛疽逆顺刺(《灵枢》:玉版)
- 五、量络刺(《灵枢》:血络论)
- 六、杂刺(《灵枢》:四时气;《素问》:长刺节论)

第二十四卷 补泻

- 一、天忌(《素问》:八正神明论)
- 二、本神论(《素问》:八正神明论)
- 三、真邪补泻(《素问》:离合真邪论)
- 四、虚实补泻(《素问》:调经论)
- 五、虚实所生(《素问》:调经论)

第二十五卷 伤寒

- 一、热病诀(《素问》:热论)
- 二、热病说(《灵枢》:热病;《素问》:评热病论)
- 三、五藏热病(《素问》:刺热论)
- 四、五藏痿(《素问》:痿论)
- 五、疟解(《素问》:疟论)
- 六、三疟(《素问》:疟论)

七、十二疟(《素问》:刺疟)

第二十六卷 寒热

一、寒热厥(《素问》:厥论)

二、经脉厥(《素问》:厥论)

三、寒热相移(《素问》:气厥论)

四、厥头痛(《灵枢》:厥病、杂病)

五、厥心痛(《灵枢》:厥病、杂病)

六、寒热杂说(《灵枢》:寒热病)

七、痈疽(《灵枢》:痈疽)

八、虫痛(《灵枢》:上膈)

九、寒热瘰癧(《灵枢》:寒热)

十、灸寒热法(《素问》:骨空论)

第二十七卷 邪论

一、七邪(《灵枢》:大惑论)

二、十二邪(《灵枢》:口问)

三、客邪(《素问》:举痛论)

四、邪中(《灵枢》:邪气藏府病形)

五、邪传(《灵枢》:百病始生、九针论)

第二十八卷 风论

一、诸风数类(《素问》:风论)

二、诸风状疹(《素问》:风论)

三、诸风杂病(《灵枢》:贼风)

四、九宫八风(《灵枢》:九宫八风)

五、三虚三实(《灵枢》:岁露论)

六、八正风候(《灵枢》:岁露论)

七、痹论(《灵枢》:周痹;《素问》:痹论、逆调论)

第二十九卷 气论

一、(篇名佚)(《灵枢》:刺节真邪)

二、津液(《灵枢》:五癃津液别)

三、水论(《素问》:解精微论)

四、胀论(《灵枢》:胀论、水胀;《素问》:腹中论)

五、风水论(《素问》:评热病论)

六、咳论(《素问》:咳论)

第三十卷 杂病

一、重身论病(《素问》:奇病论)

二、温暑论(《素问》:热病论、水热穴论)

三、四时之变(《灵枢》:论疾诊尺)

四、息积病以下,凡五十一篇,出《灵枢》:杂病、热病、癫狂病、厥病,《素问》:奇病论、腹中论、逆调论、病能论、刺腰论、通评虚实论、脉要精微论等篇。

48 以上共十九大类,每类分若干篇目,这样《素问》、《灵枢》两经的内容更有系统性了。定海黄以周评《太素》说:“《太素》改编经文,各归其类,取法于皇甫谧之《甲乙经》,而无其破碎大义之失。其文先载篇幅之长者,而以所逐之短章碎文附于其后,不使原文糅杂。其相承旧本有可疑者,于注中破其字,定其读,亦不辄易正文。以视王氏之率意窜改,不存本字,任意逐迁徙,不顾经趣者,大有径庭焉。即如《痹论》一篇,首言风寒湿杂至为痹,次言五痹不已者,为重感寒湿以益内痹,其风气胜者,尚为易治,故曰:‘各以其时重感于寒湿之气,诸痹不已,亦益内也,其风气胜者,其人易已’。王氏‘重感寒湿’句妄增风字,下又窜入《阴阳别论》一段,以致风气易已句,文义不属,经旨全晦。《太素》之文,同全元起本,不以别论屏入其中。”(《傲季文钞·旧钞太素经校本叙》)

杨上善的两经分类,虽如黄以周所云,有其优点,但从具体运用来看,仍嫌其类目琐碎,不得其要,欲以系统范之,未如所愿。并自宋元以后,残缺不全,自日本影回的仁安二年(宋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旧抄本,缺损仍较严重,欲复旧观成完璧,颇非易事。

2. 张介宾的《类经》

张介宾的《类经》是现存全部类分《素问》、《灵枢》最完整的一

部。张氏认为《素问》、《灵枢》“经文奥衍，研阅诚难。详求其法，则唯有尽易旧制，颠倒一番，从类分门，然后附意阐发”（《类经·自序》）。他经历了四十年的工夫才将《类经》著成，共分摄生、阴阳、藏象、脉色、经络、标本、气味、论治、疾病、针刺、运气、会通十二大类，凡三百九十篇目。并说：“人之大事，莫若死生，能葆其真，合乎天矣，故首曰摄生类。生成之道，两仪主之，阴阳既立，三才位矣，故二曰阴阳类。人之有生，脏气为本，五内洞然，三垣治矣，故三曰藏象类。欲知其内，须察其外，脉色通神，吉凶判矣，故四曰脉色类。脏腑治内，经络治外，能明终始，四大安矣，故五曰经络类。万事万殊，必有本末，知所先后，握其要矣，故六曰标本类。人之所赖，药食为天，气味得宜，五脏强矣，故七曰气味类。驹隙百年，谁保无恙，治之弗失，危者安矣，故八曰论治类。疾之中人，变态莫测，明能烛幽，二竖遁矣，故九曰疾病类。药饵不及，古有针砭，九法搜玄，道超凡矣，故十曰针刺类。至若天道茫茫，运行今古，苞无穷协，惟一推之以理，指诸掌矣，故十一曰运气类。又若经文联属，难以强分，或互见于别门，欲求之而不得，分条索隐，血脉贯矣，故十二曰会通类。”（《类经·自序》）

张介宾根据《素问》、《灵枢》的现存材料，结合医学的实际应用，共分做以上十二类，比起杨上善的分类方法，有所提高，扼要得多。而且张介宾并没见到过《太素》，只是通过他自己的辛勤劳动，作出这样的成绩，还是应该肯定的。

（二）选择性的分类法

此种分类法者不把《素问》、《灵枢》看做是“言言金玉，字字珠玑”，而认为它只是前人总结经验和理论的资料，随着实践的不断增长，经验的不断丰富，理论的不断提高，过去总结的东西，不可能完全与现存都相符合。因此，必须要有选择地吸收，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采用这种方法类分《素问》、《灵枢》的，元代滑寿，明代李中梓，清代汪昂、沈又彭为代表。

1. 滑寿的《读素问钞》

滑寿从京口王居中学医时，即首先学习《素问》，经反复研究，觉

得应“删去繁芜，撮其枢要”（《续素问钞·汪机序》），也就是扬弃糟粕取其精华，著成《读素问钞》。他把经过选择的有关内容，各分门类，进行编次，计分作藏象、经度、脉候、病能、摄生、论治、色脉、针刺、阴阳、标本、运气、汇萃，凡十二类。对《素问》先进行删繁撮要，再以类相从，各就部居，当以滑寿为首倡。这种方法，比杨上善和张介宾都要高明，实际张介宾的分类，基本上是以滑寿为蓝本的。

至于滑氏删去的和撮要的是否都很恰当，今天看来，固亦存在一些问题，但总的来说，还是达到了“钩元扼要”这一目标的。明代汪机称赞滑寿说：“非深于岐黄之学者不能也。”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学无心得体会，是无从进行选择，并达到“撮其枢要”的程度的。滑寿书后来经汪机给他补入注释，刊入《汪氏医学丛书》中，丁瓚又为之补注，并将滑寿的《诊家枢要》一卷，附在书的后面，名为《素问钞补正》，颇风行一时。

2. 李中梓的《内经知要》

李中梓的《内经知要》是混合《素问》、《灵枢》来选择并进行分类的。所选的内容，数量比滑氏少，而精炼的程度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讲脏腑不选《灵枢·本输》，便遗漏了五脏六腑表里相合的重要内容；讲望诊不选《灵枢·五色》，对颜面的部位都会茫然无所知；讲经络不选《灵枢·经脉》，对于手足阴阳各经的循行起讫毫无分晓；相反，如五运六气等，不是急切所需，省略之亦无太碍。因此，中梓所辑的《内经知要》仅上下两卷，分做道生、阴阳、色诊、脉诊、藏象、经络、治则、病能八类，已足以概括祖国医学的基础理论而无遗。所以是书不仅到现在仍为大众所欢迎，即选辑《医经原旨》的作者，亦承认《内经知要》比他的选辑技术要高明些。

至中梓于各类之末所作的按语，反多系浮泛之词，无甚精当处，甚至还涉及唯心之论。如他在道生类的按语说：“兹所摘者，不事百草，而事守一；不尚九候，而尚三奇。盖观天之道，执天之行，进百年为万古尊生之道，于是为大矣。”所谓“守一”、“三奇”，不过是道士自欺欺人的神秘论，实于医学无涉，而中梓反以家珍自

宝,不亦妄乎。

3. 汪昂的《素问灵枢类纂约注》

汪昂的《素问灵枢类纂约注》,是一部以《素问》为主,而《灵枢》副之的类选本。凡分藏象、经络、病机、脉要、诊候、运气、审治、生死、杂论九类。他选辑和分类的方法,总的说来有以下几点:《素问》、《灵枢》各八十一篇,其中病证脉候、脏腑经络、针灸方药,错见杂出,读之茫无津涯,难得窾会,实有节其繁芜,进行一次比类分次的必要;滑寿的《读素问钞》用意是很好的,惜其割裂全文,更为贯穿,虽分门类,而凌躐错杂,遂有失原书的面貌,是其所短;滑寿所钞,仅限于《素问》一经,不如两经珠联而条析之,则更为完好;《素问》治兼诸法,文悉义顺,故说理之文多,而《灵枢》专重针灸,故说数之文多,无妨以《素问》为主,《灵枢》副之,其《素问》与《灵枢》同者,皆用《素问》,而不用《灵枢》,因《素问》所引经文,多出《灵枢》,是《灵枢》在前,《素问》居后,踵事增华,故其文义为尤详也;所分九类,虽有删节,两段落依旧,并注明出于某篇,不致谬为参错,至于入选的,总以期其适用而止;所有加注,十之七均选自王冰、马蒨、吴昆、张志聪四家,十之三略陈述自己的意见,或节其繁芜;或辨其谬误,或畅其文义,或详其未悉,或置为缺疑,务令语简义明,所以名为《约注》。

总之,汪昂的《素问灵枢类纂约注》,在《素问》、《灵枢》分类节注中,不失为善本。

4. 沈又彭的《医经读》

沈又彭的《医经读》,是类分中最简明的选本,它分做“平、病、诊、治”四类。平,指脏腑气血等的正常生理,取义于《素问·平人氣象论》;病,包括病机、病证;诊,即诊法;治,即治则。换言之,即脏腑、疾病、诊法、治则四大类。从实际运用来看,分类虽不多,却是最恰切的。惜其所选的内容,并不如滑、李、汪诸家选的精当。例如,他在“平集”类选列的第一条是《素问·上古天真论》“昔在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登天。”这几句话原出

《大戴礼》，在《素问》开首选用它，有其一定的意义。沈氏的“平集”开首仍选用它，可说对于脏腑生理，毫不相关，便没有什么道理了。

(三) 调整篇次分类法

对两经各篇原文的内容完全不动，只是将其篇次予以重行分类，诸家中惟黄元御独用此法，兹将黄元御对两经分类的安排，分别臚列于下。

1. 《素问悬解》的分类

养生类：上古天真论、四气调神论、金匱真言论、生气通天论、阴阳应象大论。

藏象类：十二藏相使论、五藏别论、五藏生成、藏气法时论、宣明五气。

脉法类：经脉别论、三部九候论、平人气象论、脉要精微论、玉机真藏论、通评虚实论、诊要经终论、玉版论要、阴阳别论、大奇论。

经络类：阴阳离合论、血气形志、太阴阳明论、脉解、阳明脉解、皮部论、经络论。

孔穴类：气穴论、气府论、水热穴论、骨空论。

病论类：风论、痹论、痿论、厥论、咳论、疟论、热论、评热病论、举痛论、气厥论、逆调论、腹中论、病能论、奇病论、标本病传论、本病论（王冰注亡。黄氏自《玉机真藏论》“五藏相通”句起至“传乘之名也”句止移此）。

治论类：汤液醪醴论、移精变气论、异法方宜论。

刺法类：宝命全形论、针法、八正神明论、离合真邪论、四时刺逆从论、刺法论（王注亡，黄氏自《诊要经终论》篇首至“此刺之道也”句止移此）、刺志论、刺禁论、刺要论、刺齐论、长刺节论、调经论、缪刺论、刺疟、刺热、刺腰痛。

雷公问类：阴阳类论、著至教论、示从容论、疏五过论、征四失论、方盛衰论、解精微论。

运气类：六节藏象论、天元纪大论、五运行大论、六微旨大论、气交变大论、五常政大论、至真要大论、六元正纪大论。

2.《灵枢悬解》的分类

刺法类：九针十二原、小针解、九针论、官针、终始、官能、刺节真邪、逆顺、行针、血络论、论勇、论痛、五邪、五乱、五禁、玉版、师传、外揣、禁服。

经络类：经脉、经别、经筋、经水、阴阳清浊、本输、根结、标本（原注：旧本误名卫气，按经文正之）、动输、背腧、四时气、逆顺肥瘦。

营卫类：脉度、五十营、营气、卫气行、卫气失常、营卫生会。

神气类：本神、决气、津液五别（原注：旧本误作《五癰津液别》，按经文正之）。

藏象类：海论、肠胃、平人绝谷、五味、五味论、骨度。

外候类：本藏、五阅五使、五色、天年、寿夭刚柔、五变、论疾诊尺、阴阳系日月、通天、阴阳二十五人、五音五味。

病论类：口问、大惑论。

贼邪类：九宫八风、岁露论、贼风、邪客。

疾病类：百病始生、邪气藏府病形、病本、病传、淫邪发梦、顺气一日分为四时、杂病、胀论、水肿、周痹、上膈、忧患无言、癫狂、厥病、寒热、寒热病、热病、痈疽。

破篇以分类，取其义之可类者而分之，自较易易，若元御移整篇以类分，义能合者固有，其不能合者，强以类从，则不免有削足适履之嫌。至谓《本病论》未亡，在《玉机真藏论》中；《刺法论》亦未佚，在《诊要经终论》中。此为一家之言可见，若揆诸古义，则未必如此。



专题发挥《黄帝内经》诸家

从上述诸家对《黄帝内经》的分类来看，《素问》、《灵枢》两部分内容，基本上是包括了中医学基础理论的各个方面。因而历代不少医家各就其所长，选择其中的某一个或几个主题，进行发挥，竟成为一家之言，做出了出色的成绩。例如：秦越人之著《难经》，主要是发

挥《素问》、《灵枢》的“经脉”和“脉诊”的；张仲景之著《伤寒论》，主要是阐发《素问》、《灵枢》的热病证治；皇甫谧之著《甲乙经》，主要是阐发《素问》、《灵枢》的经脉、俞穴、针刺；华佗之著《中藏经》，把《素问》、《灵枢》中的脏腑寒热虚实辨，整理出一个系统来；王叔和之著《脉经》，在《难经》、《伤寒论》的基础上，对《素问》、《灵枢》的“脉法”做了进一步的整理提高等。其他如刘完素之著《宣明论方》，骆龙吉、刘浴德、朱练之著《内经拾遗方论》，陈无咎之著《明教方》，对于《素问》、《灵枢》的杂病，结合临床来研究，都取得不同的成就。这些都是我们今日研究《黄帝内经》很值得取法的。

（一）秦越人与《难经》

战国时的秦越人，取《素问》、《灵枢》中有关经脉、脏腑的文献发挥为《八十一难经》，其中尤以发挥“经脉”内容为主，而“经脉”之中又以发挥“脉法”最有成就，为后世所称颂。故圭斋欧阳氏说：“切于手之寸口，其法自秦越人始，盖为医者之祖也。”（《难经本义·汇考》引）《难经》所言“脉法”，主要见于《难经》“一难”至“二十二难”，其中有所发明者如下。

1. “独取寸口”之说

秦越人提出“独取寸口”，并分寸、关、尺三部。《素问·五藏别论》仅言“气口何以独为五藏主？”并没有说“独取寸口”，而秦越人以寸口为“脉之大会”，又是“五脏六腑之所终始”，故可以独取之。《素问》切脉的三部，是言头、手、足，不是寸、关、尺，偶亦谈“尺脉”，并未与“寸”相对而言，全书更没有提到“关脉”。至说“从关至尺，是尺内，阴之所治也，从关至鱼际，是寸口内，阳之所治也”这种提法，显然是从秦越人开始的。

2. 以菽法权轻重

《难经·五难》说：“脉有轻重何谓也？然，初持脉如三菽之重，与皮毛相得者，肺部也；如六菽之重，与血脉相得者，心部也；如九菽之重，与肌肉相得者，脾部也；如十二菽之重，与筋平者，肝部也；按之至骨，举指来疾者，肾部也。故曰轻重也。”日人丹波元简《脉学辑

要》解释说：“菽，小豆也。三菽者，每部一菽也；六菽者，每部两菽也；九菽、十二菽仿此。”《素问·经脉别论》说：“气归于权衡，权衡以平。”好比天秤，以一菽置于一端，则一端低下若干，以比手指在脉口按下若干。所以丹波的解释，还是近情合理的。总之，用菽法来说明指按的轻重，主要是说明指按之力宜轻，而不宜过重，这个精神是很可取的。

3. 呼吸定息分脉之阴阳

《难经·四难》说：“脉有阴阳之法何谓也？然，呼出心与肺，吸入肾于肝，呼吸之间，脾受谷味也。其脉在中。”呼出为阳，吸入为阴；心肺为阳，肝肾为阴，各以部位的高下而应之。一呼再动，心肺所主；一吸再动，肝肾所主；呼吸定息脉五动，闰以太息，为脾所主。所谓“其脉在中”，即指脉应于阴阳呼吸之间而言。一般所谓“肺主出气”、“肾主纳气”即源于此。

(二) 张仲景与《伤寒论》

后汉张仲景据《素问·热论》“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伤于寒也，则为病热”之说，认为所伤的寒邪，应该是病因，所出现的发热症状，是寒邪为病的反应。则伤寒为因，病热是果，“因”是病变的本质，“果”是病变的现象，辨识疾病，当然要抓住病变的本质，便把这一性质发热的病叫做“伤寒”，而不再叫“热病”。并在他的名著《伤寒论》中一再强调：“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为伤寒。”“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说明“恶寒”这一症状，是伤寒病的主要表现，而“发热”反而退居第二位。根据临床实践，仲景这一认识是完全符合客观实际的，是非常正确的。

《素问·热论》对热病的辨证，是以三阴三阳为纲的，它说：“伤寒一日，巨阳受之，故头项痛、腰脊强；二日，阳明受之，阳明主肉，其脉夹鼻络于目，故身热、目疼而鼻干，不得卧也；三日，少阳受之，少阳主胆，其脉循胁络于耳，故胸胁痛而耳聋。三阳经络皆受其病，而

未入于藏者，故可汗而已。四日，太阴受之，太阴脉布胃中络于嗌，故腹满而嗌干；五日，少阴受之，少阴脉贯肾络于肺，系舌本，故口燥、舌干而渴；六日，厥阴受之，厥阴脉循阴器而络于肝，故烦满而囊缩。三阴三阳，五藏六府皆受病，营卫不行，五藏不通，则死矣。”

张仲景对伤寒病的辨证，仍然是用三阴三阳为纲的。故《伤寒论》说：“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疼而恶寒。”“阳明之为病，胃家实是也。”“少阳之为病，口苦，咽干，目眩。”“太阴之为病，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下结硬。”“少阴之为病，脉微细，但欲寐。”“厥阴之为病，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食则吐蛔，下之利不止。”

两相比较，《素问·热论》的三阳经症状，都是仲景的太阳证。《素问·热论》的三阴经症状，都是仲景的阳明承气证。而仲景的少阳证和三阴证，都为《素问·热论》所无。仲景的这一辨证方法，一直指导中医在临床上的运用。说明仲景在《素问·热论》的基础上，结合临床实践，有所去取，有所提高。所以柯琴曾经加以评论说：“《热论》之六经（三阴三阳），专主经脉为病，但有表里之实热，并无表里之虚寒……但有可汗可泄之法，并无可温可补之例……仲景之六经，是分六区地面，所该者广……凡风寒温热，内伤外感，自表及里，有寒有热，或虚或实，无乎不包。”（《伤寒论翼·六经正义》）

的确，仲景的六经辨证方法，可用于多种疾病，不局限于伤寒或热病，指导临床，行之有效，比之《素问·热论》从理论上较大的提高，对临床的指导价值不能同日而语。

（三）华佗与《中藏经》

后汉华佗所著的《中藏经》及《内照法》，专以发挥《素问》、《灵枢》的色诊、脉诊，以及辨脏腑虚实寒热的病证，这是从平脉辨证的角度，研究《素问》、《灵枢》最成系统，而又是最早的著作。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莫过于《论五脏六腑虚实寒热生死顺逆之法》。它从《素问》的《玉机真藏论》、《平人氣象论》、《藏气法时论》、《脉解》，《灵枢》的《经脉》、《本藏》、《本神》、《淫邪发梦》、《邪气藏府病形》

等篇来加以分析、归纳,并贯穿着他本人的临床经验而成就了《中藏经》。

例如辨肝脏的脉证,首先,明确肝的生理属厥阴,主春气,与少阳胆腑互为表里,并以“嫩而软,虚而宽”描述了肝主柔和、疏泄的生理特征。其次,分析肝主弦脉,而有弦长、弦软、弦实、弦虚之不同,及其所主太过、不及的病变。又其次,从肝的病脉缓、急、大、小、滑、涩六个方面,提出其不同的主证。再其次,分析肝病的发展和转归,最后列出肝中寒、肝中热、肝虚冷三大证候。其他脏腑详略虽有不同,体例都大致如此。

《素问》、《灵枢》所言肝的脉证,或其他脏腑的脉证,固然要比华佗详备,但都是分散杂述于若干篇章之中的,并不成体系。自华佗第一次以脉证为中心,分述五脏六腑的寒热虚实病证以后,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张元素的《医学起源》咸宗之,而为脏腑辨证之所本。双流张骥说:“华佗之学,精于张机,今取《中藏》、《内照》二篇读之,其所著论,往往与《灵》、《素》、《难经》相为表里。”不仅是相为表里的问题,而是华佗在《素问》、《灵枢》的基础上,把脏腑辨证的理论系统化,并大大地提高了一步。

(四) 王叔和与《脉经》

西晋王叔和所著《脉经》,是现存最早的一部讨论脉学的专书。它除对《素问》、《灵枢》所言脉法,进行一番整理外,复取《难经》、《伤寒论》、《四时经》加以充实。《四时经》即《隋志》所载《三部四时五脏辨诊色决事脉》,书已佚,今仅见于《脉经》中。《素问》、《灵枢》、《伤寒论》所言单见脉象数十种,复出脉象竟达数百种,经过王叔和的整理,定为二十四种:

浮脉:举之有余,按之不足。

芤脉:浮大而软,按之中央空,两边实。

洪脉:极大在指下。

滑脉:往来前却流利,展转替替然,与数相似。

数脉:来去促急。

促脉：来去数，时一止复来。

弦脉：举之无有，按之如弓弦状。

紧脉：数如切绳状。

沉脉：举之不足，按之有余。

伏脉：极重指按之，著骨乃得。

革脉：有似沉伏，实大而长，微弦。

实脉：大而长，微强，按之隐指幅幅然。

微脉：极细而软，或欲绝，若有若无。

涩脉：细而迟，往来难且散，或一止复来。

细脉：小大于微，常有，但细耳。

软脉：极软而浮细。

弱脉：极软而沉细，按之欲绝指下。

虚脉：迟大而软，按之不足，隐指豁豁然空。

散脉：大而散。散者，气实血虚，有表无里。

缓脉：去来亦迟，小驶于迟。

迟脉：呼吸三至，去来极迟。

结脉：往来缓，时一止复来。

代脉：来数中止，不能自还，因而复动。脉结者生，代者死。

动脉：见于关上，无头尾，大如豆，厥厥然动摇。

王叔和定出二十四种单见脉，也就是二十四种基本脉象，每种脉象并作了简明的解释，为后世言脉的唯一根据。《难经》仅言寸关尺三部，王叔和又从而述之，并引据《脉法赞》以五脏六腑分配于三部，左寸心与小肠，左关肝与胆，左尺肾与膀胱；右寸肺与大肠，右关脾与胃，右尺与左尺同。除六腑的配属，后世略有争议外，五脏配属一直以此为准，其影响后世之深，可以概见。

叔和还从脏腑虚实所见之证，结合寸关尺所见虚实之脉，并按脏腑的表里关系，分别予以叙述，这样脉证结合，使人更易于运用于临床，但却引起喻昌的微议。金山钱熙祚为之辩曰：“王叔和取《素》、《灵》以下诸家论脉之文，分类编次，为《脉经》十卷，宋林亿称

其若网在纲,有条不紊。使人占外以知内,视死而别生,可谓推崇之至矣。而西昌喻氏则谓于汇脉之中,间一汇证,不该不贯。抑知形有盛衰,邪有微甚,一证恒兼数脉,一脉恒兼数证,故论证不论脉不备,论脉不论证不明,王氏汇而编之,深得古人微旨。”(《金山钱氏学刻书目》)钱氏的说法是正确的,言脉不遗证,不能说不是叔和的卓识。

(五)皇甫谧与《甲乙经》

皇甫谧精于针灸学,他把《素问》、《灵枢》有关经脉、俞穴、针法几部分的内容,与当时还存在的《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综合起来,以类相从,撰成《针灸甲乙经》十二卷。第一卷,总述脏腑气血津液凡十六论;第二卷,概叙经脉经筋凡七篇;第三卷,综列全身六百五十四穴;第四卷,脉法三篇;第五卷,分论针灸大法七篇;第六卷,分析病机十二论;第七卷以下,列叙病证四十八篇。

《甲乙经》将《素问》、《灵枢》一变而为针灸专科典籍。因此,皇甫氏的《甲乙经》一直是今天仅能见到的最古老的针灸书。特别是书中把胸、腹、头、背部的俞穴,均从体表划分几根线来排列。例如:背自第一椎循督脉下行至脊骶,凡十一穴,这是正中line;背自第一椎两旁夹脊各离一寸五分下至节,凡四十二穴,这是第一旁行线;背自第二椎两旁夹脊各距三寸,行至二十一椎下两旁夹脊,凡二十六穴,是为第二旁行线。这样寻找俞穴,便利而准确。自从皇甫氏创此先例以后,唐甄权《明堂图》,孙思邈《千金方》,均宗其例,实为俞穴图的一大改革。

但后来竟引起黄以周的非议,他说:“人之一身,无非三阴三阳及督任诸脉为之经络,欲治其病,必先原其何经所发,而后按其孔穴,施以针灸,此古道也。后人苦经脉之难觅,孔穴之难检,以《甲乙经》法为简易,遂群焉宗之,往往有知其穴而不知其经,知其治而不知其病之所发,忘本逐末,弊一至此。且《甲乙经》既以人身分部,独于手足题十二经之名,岂十二经专属手足,而头面肩背胸腹之穴,无关于十二经乎!此皇甫谧之疏也。”其实,皇甫谧所记载的每一俞

穴,都注明了所属经脉的。例如:“肓门,在第十椎下两傍各三寸,人肘间,足太阳脉气所发。刺入五分,灸三壮。”“天鼎,在缺盆上,直扶突,气舍后一寸五分,手阳明脉气所发。刺入四分,灸三壮。”这样怎会造成“知其穴而不知其经,知其治而不知其病之所发”呢?

总之,皇甫氏这一创新的检穴法,对于临床取穴是很便利的。

(六) 刘完素与《宣明论方》

《素问》、《灵枢》叙述病症一百余种,对于病机之阐发,治则之确立,制方之大法,针刺之详分缕析,一直为历代医家之所矜式。独于针对病症的具体处方,却忽焉不详。两经中之所可指者,不过汤液醪醴、生铁落饮、左角发酒、泽泻饮、鸡矢醴、治口甘方、乌贼骨丸、豕膏、半夏汤、菱翘饮、马膏膏法、棉布熨法十二方而已。

金代刘完素在其所著的《宣明论方》的第一、二卷中,汇集《素问》所述六十一个病症,分别予以对症处方,这算是从临证角度来探讨《黄帝内经》病症较早的一个。他在《素问玄机原病式》的序文里说:“本乎三坟之圣经,兼以众贤之妙论,編集运气要妙之说,十万余言,九篇三部,勒成一部,命曰《内经运气要旨论》,备见圣贤之用矣。然,妙则妙矣,以其妙道,乃为对病临时处方之法,犹恐后学未精贯者,或难施用,复宗仲景之书,率参圣贤之说,推夫运气造化自然之理,以集伤寒杂病脉证方论之文,一部三卷,十万余言,目曰《医方精要宣明论》。”

从序文中得知,刘完素是在著好《内经运气要旨论》的基础上,再著这《宣明论方》的,除对《素问》六十一病症各系方药外,还有十余门许多杂病。所以他才提到“集伤寒杂病脉证方论之文”,其所列病症选用诸方,试略列举如下。

结阳证,主四肢。四肢肿,热胜则肿,四肢者,谓诸阳之本,阳结者,故不行于阴脉,阴脉不行,故留结也,犀角汤主之。治结阳,四肢肿满,热菟不散,或毒攻注,大便秘涩。犀角、玄参、连翘、柴胡各半两,升麻、木通各三钱,沉香、射干、甘草各一分,芒硝、麦门冬各一两。

结阴证,主便血。结阴便血一升,再结二升,三结三升,以阴气内结,故不得通行,血气无宗,渗入肠下,致使渐多。地榆汤主之,治阴结下血不止,渐渐极多,腹痛不已。地榆四两,甘草三两(半炙半生),缩砂仁七枚。

结阳证、结阴证,在《素问·阴阳别论》中仅简单地说:“结阳者,肿四肢;结阴者,便血一升,再结二升,三结三升。”刘完素结合其临证经验,把两证的临床见症、病变机制、治疗方药,都具体地胪列出来,以示后人。像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七) 骆龙吉与《内经拾遗方论》

上述刘完素所集病症,并各系以方药,仅限于《素问》中的一部分。后有骆龙吉者,集《素问》、《灵枢》的六十二病症,亦各系以方药,名曰《内经拾遗方论》,其选方多采自刘完素、张元素、朱震亨、李东垣、王好古、罗天益、吴昆诸家。其对于每一病症的病机分析,及其处方,较河间尤为贴切,足见临床经验之丰富。如“痛痹”之用“乌头汤”,“飧泄”之用“调中益气汤”,“结阴”之用“艾梅饮”等,均足以证之。

(八) 刘浴德、朱练与《重订骆龙吉内经拾遗方论》

至明代万历年间,有刘浴德、朱练二氏,在《内经拾遗方论》的基础上,又续于《素问》、《灵枢》两经中增辑八十八病症,合共一百五十病症,名曰《重订骆龙吉内经拾遗方论》。《黄帝内经》中所述病症,基本上都列入了,二氏于所列诸病症虽无甚发明,但选用诸方,却平正适宜。

(九) 陈无咎与《明教方》

论病必宗《黄帝内经》,并以征诸实验者,在近代医家中,当推陈无咎。无咎私淑河间、丹溪之学,曾于临证实践中阐发《素问》、《灵枢》病症一百例,著成《明教方》,以实验征诸学理,一以《黄帝内经》为依据。试举两例如下。

“郑缝工,痈肿症,主血郁。《素问·生气通天论》曰:‘营气不从,逆于肉理,乃生痈肿。’(王注:营逆则血郁,血郁则热紧为脓,故

为痛肿)今风府生痛,红肿焮痛,正是血郁上逆,俗名对口,此处与人迎相对,溃烂则脉断脘裂而死。宜一物石藤饮。石蛭龙藤四两,煎浓汁频频饮之,一剂轻,三剂已。”

“徐氏妇,伏梁证,主心肾。《素问·腹中论》曰:‘人有身体髀、股、肱皆肿,环脐而痛,是为何病?曰:病名伏梁,以风根也。其气溢于大肠,而着为盲,盲之原在脐下,故环脐而痛也,不可动之,动之为水溺涩之病。’今六脉沉伏,心肾尤涩,舌苔薄白,血不归心,气不归肾,心下有积,大如儿臂,环脐而痛,名曰伏梁。病由于风入肾宫,大肠气壅,更因脑郁伤心,血凝不散,积久成形,不宜攻下,应通盲丸:炙没药二钱,姜黄连、炒丹参、姜厚朴各一钱,当归尾五钱,川郁金、炒香附末、炙乳香各七分,木通、焦于术各钱半,三七五分。”

总之,陈无咎论病必本于《黄帝内经》,而处方则多为自制新方,并都通过实践而证明其理,检验其方,于近代医家中实独树一帜,不仅有河间之遗绪,并凌驾于《内经拾遗方论》诸人之上矣。



《黄帝内经》的学术思想

(一) 阴阳学说

我国早在春秋时代已有一种朴素唯物主义的元素论,企图以阴阳五行来说明世界万物的成因。《黄帝内经》作者吸收了这一思想后,一方面固然以之贯彻其朴素的唯物主义精神,另一方面还从中体现了自发的辩证法思想。

首先,认为人类生命变化是按照阴阳的对立法则进行的,因而人体本身就是个阴阳对立的统一体。故《素问·金匱真言论》说:“夫言人之阴阳,则外为阳,内为阴;言人身之阴阳,则背为阳,腹为阴;言人身之藏府中阴阳,则藏者为阴,府者为阳;肝、心、脾、肺、肾五藏皆为阴,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六府皆为阳。”身内与身外,是相互对立的,故有“内”必有“外”。人身诸阳经之脉皆行于

背,故背为阳,诸阴经之脉皆行于腹,故腹为阴,背与腹是相互对立的,故有“背”必有“腹”。五脏主生精而内藏,六腑主传化而外泄,阴脏阳腑亦是相互对立的,故有“脏”必有“腑”。这身内身外、背腹、脏腑,尽管它们是阴阳对待不同的两个方面,但统一起来却发挥其相辅相成的作用。对立统一的协调,就能维系人体生命的健康,所谓“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也。假使对立统一遭到了破坏,生命的活动就会发生病变,亦所谓“阴阳离决,精气乃绝”也。

其次,还指出“阴”和“阳”的对立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所以两者之间,经常会表现为互相蕴涵,不可截然分割的关系。正如《素问·金匱真言论》所说:“阴中有阴,阳中有阳。平旦至日中,天之阳,阳中之阳也。日中至黄昏,天之阳,阳中之阴也。合夜至鸡鸣,天之阴,阴中之阴也。鸡鸣至平旦,天之阴,阴中之阳也。故人亦应之。”“背为阳,阳中之阳,心也;背为阳,阳中之阴,肺也;腹为阴,阴中之阴,肾也;腹为阴,阴中之阳,肝也;腹为阴,阴中之至阴,脾也。此皆阴阳、表里、内外、雌雄相输应也,故以应天之阴阳也。”这就告诉我们辨识“阴”与“阳”的对立,都不能绝对化。“阴、阳”这两个方面,总是互为其根的,如截然分开,便失其对立统一的意义。如既以“白天”为阳,“夜晚”就为阴了,但中午以前为阳气之最盛,中午以后为阳气之渐衰,故前者为“阳中之阳”,后者为“阳中之阴”;夜半以前为阴气之最盛,夜半以后为阴气之渐衰,故前者为“阴中之阴”,后者为“阴中之阳”。又如,既以背腹分阴阳,而五脏都属阴矣,但心和肺脏均位于膈上而系于背,故为背之二阳脏,唯心以离火为用,肺以清金治节,因之又有“阳中之阳”与“阳中之阴”的区别;脾和肝肾均位膈下而系于腹,故为腹之三阴脏,唯脾属中土而主运化,为阴阳上下之枢,因称之为“至阴”(“至”即上下往复之义,如“冬至”一阳复始,名之曰“至”,“夏至”一阴复生,亦名之曰“至”,其义均同),肾属水而藏阴精,是曰“阴中之阴”,肝属木而同少阳,是曰“阴中之阳”。凡此阴阳中又分阴阳,无论在自然界,在人体,都是一样的,而没有绝对的“阴”或“阳”。

又其次,阴与阳两个对立面,在其运动过程中,往往是互为转化的。如《灵枢·营卫生会》说:“故太阴主内,太阳主外,各行二十五度,分为昼夜。夜半为阴陇,夜半后而为阴衰,平旦阴尽而阳受气矣。日中为阳陇,日西而阳衰,日入阳尽而阴受气矣。夜半而大会,万民皆卧,命曰合阴,平旦阴尽而阳受气,如是无已,与天地同纪。”这是言人身营气、卫气的运行,白天黑夜,阴经阳经,是相互转化的。营气的运行,始于手太阴肺经,尽历六阴经,而复会于手太阴肺经,都在夜,是为“太阴主内”。卫气的运行,始于足太阳膀胱经,尽历六阳经,而复会于足太阳膀胱经,都在昼,是为“太阳主外”。平旦之时,由阴转阳;日入以后,由阳转阴。人身营卫气运行的这种阴阳转化的规律,与大自然界的阴阳转化规律,殊无二致。是谓“与天地同纪”。自然界的阴阳转化,最显明的,莫如气候的变易。《灵枢·论疾诊尺》说:“四时之变,寒暑之胜,重阴必阳,重阳必阴,故阴主寒,阳主热。故寒甚则热,热甚则寒。故曰:寒生热,热生寒,此阴阳之变也。”阴寒、阳热,是阴阳的正气。寒之至极而生热,是从阴转变为阳的征象,在四时,则秋冬尽而春夏生;热之至极而生寒,是以阳转变为阴的征象,在四时,则春夏去而秋冬来。这种寒暑互易的阴阳变化,正所谓“物极谓之变”也。邵康节说:“动之始则阳生,动之极则阴生;静之始则柔生,静之极则刚生。”都是在说明物极必反,阴阳两个对立面,运动而至于极点,必转化而为相反的一面的道理。

以上是《黄帝内经》以元素论、朴素的唯物论主义阴阳学说为基础,结合当时的自然科学,尤其是医学科学,阐发阴阳,说明事物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而两个对立面又是互相蕴涵的,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两个对立面在发展过程中,到了一定的程度,必然互为转化,一变而为相反的一面。这种自发的辩证法思想,比元素论实提高了一大步。

(二)五行学说

至于元素论的五行说,《黄帝内经》主要从其“生治”与“承制”两方面,来说明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而每一事物又是不可分割的

整体。《素问·六微旨大论》说：“显明之右，君火之位也；君火之右，退行一步，相火治之；复行一步，土气治之；复行一步，金气治之；复行一步，水气治之；复行一步，木气治之；复行一步，君火治之。相火之下，水气承之；水位之下，土气承之；土位之下，风气承之；风位之下，金气承之；金位之下，火气承之；君火之下，阴精承之。”“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外列盛衰；害则败乱，生化大病。”

从“显明之右”到“君火治之”，是言五行的相生，其顺序为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又生火，以至往复无穷。为什么以这样为相生顺序？其间又如何相生呢？这是按照一年春、夏、长夏、秋、冬五个季节的顺序变迁而立说的。如《素问·玉机真藏论》云：“春脉者，肝也，东方木也，万物之所始生也。”“夏脉者，心也，南方火也，万物之所以盛长也。”“秋脉者，肺也，西方金也，万物之所以收成也。”“冬脉者，肾也，北方水也，万物之所以合藏也。”“脾为孤藏，中央土以灌四傍。”土，虽然说得不够明确，但《素问·藏气法时论》却明白指出“脾主长夏。”全元起注云：“脾主中央，六月是十二月之中，一年之半，故主六月也”。王冰注云：“长夏谓六月也，夏为土母，土长于中，以长而治，故云长夏。”以此而知所谓木生火，即由春而夏；火生土，即由夏而长夏；土生金，即由长夏而秋；金生水，即由秋而冬；水生木，即由冬而春。如此五个季节，顺序相生，实为自然变化的规律所在。“生”即奉养之义。所以在《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秋之于冬，则曰“奉藏”；冬之于春，则曰“奉生”；奉之于夏，则曰“奉长”；此即相生之义也。一年五季，春木、夏火、长夏土、秋金、冬水，以次相生，则春生、夏长、长夏化、秋收、冬藏的生化，便秩然不紊，所以叫做“治”。

“从相火之下”到“火气承之”，是五行的“承制”关系，一般称为“相克”，其规律是，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所谓克，即是“克制”，亦即“制约”。所以王履解释说：“承，犹随也。然不言随，而曰承者，以下言之，则有上奉之象，故曰承。虽谓之承，而有防之之意存焉。亢者，过极也……其不亢则随之而已，故虽承而

不见。既亢，则克胜以平之，承斯见矣。”（《医经溯洄集》）

为什么“五者”之间要这样相互承制呢？黄元御则谓：“相克者，制其太过也。木胜发散，敛之以金气，则木不过散；火性升炎，伏之以水气，则火不过炎；土性润湿，疏之以木气，则土不过湿；金气以敛，温之以火气，则金不过收；水性降润，渗之以土气，则水不过润。皆气化自然之妙也。”（《四圣心源·五行生克》）于此知道五行间的相互制约，主要是防其太过，以维系正常。如果是已经发生了太过的情形，也可以通过制约的作用，抑其太过，以回复正常。

可见“相生”与“相克”，是维系事物正常发展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黄元御还说：“其相生相克，皆以气而不以质也，成质则不能生克矣。”意思就是说，言生克的五行，已经是从认识事物的本质抽象出来的理性知识，而成为分析事物相互关系的一种方法，不再是指五种实物的本体了，正如《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谓：“以名命气，以气命处，而言其病。”如肝以柔和为佳，富含生发之机，便以能曲能直的“木”名之；脾以运化为事，为生化精气之源，便以化生万物之“土”名之。因此，虽言肝木，绝不能与松柏并为一谈；虽言脾土，亦不能与田地混为一事。这一点很重要，言五行而不知此，势必穿凿附会，曲之为说，终不能得其生克的精义。

（三）整体观

统一整体观，也是《黄帝内经》里主要学术思想之一。它首先认为人体内部是个统一的整体，体内任何一个或大、或小的组织，都是互有联系，而不可能是孤立的。《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上古圣人，论理人形，列别藏府，端络经脉，会通六合，各从其经，气穴所发，各有处名，溪谷属骨，皆有所起，分部逆从，各有条理，四时阴阳，尽有经纪，外内之应，皆有表里。”

这指出凡言人的形体、脏腑、经脉，气穴、溪谷等等，既要分别了解它们的所发、所属、所起，更要知道它们彼此间的内外相应，六合会通，逆从分部，表里关系之所在。所以尽管人体的一脏、一腑、一经、一络、一气穴、一溪谷，都有它不同的功能，而且都能正常地进行

其不同的功能活动。首在于它们相互间的关系能够维持正常才行。故《素问·灵兰秘典论》说：“十二藏之相使，贵贱何如？”“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大肠者，传道之官，变化出焉；小肠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殁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

所论明确了三个问题：第一，十二脏腑，各有专司，功能既不同，职责即互异；第二，十二脏腑之间，它们是相互为用的，也就是所谓“相使”，但是其“相使”之间各有“贵贱”，即有大有小、有直接、有间接、有主要、有次要的不同区别；第三，十二脏腑不同功能的配合，竟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主要是由于“气化”的共同作用，尤其是阳气，所谓“主明”、“主不明”，就是指阳气的盛或衰而言。其中“阳气”尤为重要，心为离火，属阳中之阳，主明而阳盛，则气化正常，十二脏腑的作用，就能维持正常，“相使”不替；主不明而阳衰，则气化不足，十二脏腑的功能，可能要生故障，以致“相使”常乖。关于这一点，赵献可颇有发挥，不过他强调“君主”为命门而已。

同时，人这个整体与外在环境又有密切的关系。外在环境无时无刻不是在变化之中，而人体内的生理功能，一方面需要外在的变化来帮助体内的功能活动，另一方面如外在变化不利于功能活动时，体内却能相应的发生种种活动来与之适应。正如《素问·六节藏象论》所说：“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五气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声能彰；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养五气。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

自然界五气的变化，曰：臊、焦、香、腥、腐。臊气入肝，焦气入心，香气入脾，腥气入肺，腐气入肾。五味的变化，曰：酸、苦、甘、辛、

咸。酸味入肝，苦味入心，甘味入脾，辛味入肺，咸味入肾。五气五味入于人体，或从肺以及于诸脏腑，或从胃以及于诸脏腑，都能有助于生理功能的正常进行。所谓“神”，即指脏腑功能的高度活动而言。不仅如此也，自然界一年几个季节中的气候变化，对人体脏腑的功能活动，都有不同的帮助。仍如《素问·六节藏象论》所谓：“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肺者，气之本，魄之处也，其华在毛，其充在皮，为阳中之太阴，通于秋气。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其华在发，其充在骨，为阴中之少阴，通于冬气。肝者，罢极之本，魂之居也，其华在爪，其充在筋，以生血气，此为阳中之少阳，通于春气。脾、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者，仓禀之本，营之居也，名曰器，能化糟粕，转味而出入者也，其华在唇四白，其充在肌，此至阴之类，通于土气。”

夏季火热最盛，有助于心的阳宣；秋季金气正隆，有助于肺的肃降；冬季水寒凝固，有助于肾的蛰藏；春季木气和畅，有助于肝的生发，长夏（土）是一年当中百物盛长、变化成熟的季节，有助于脾胃等器官的消化传导诸作用。这些合适的资助，即所谓“通”也。

又如《灵枢·五癯津液别》说：“天暑衣厚则腠理开，故汗出；寒留于分肉之间，聚沫则为痛。天寒则腠理闭，气湿不行，水下留于膀胱，则为溺与气。”天气变得过于暑热和严寒，对人体都有一定妨碍，但体内的生理功能，尤其是阳气的活动，便因之而产生两种不同的适应性变化。太热了，阳气便充分放散，使肌腠松弛而多排汗；太冷了，阳气便充分内蓄，使肌腠致密而少排汗，必须排的，亦使多从小便而出，这便同样维持了人的常温，而不致于病。甚至在一天的气温变化当中，体内生理功能无时无刻不是在与之作相应的变化。《素问·生气通天论》说：“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是故暮而收拒，无扰筋骨，无见雾露，反此三时，形乃困薄。”

在一天之中，阳气总是负担起卫外的作用，从平旦到日中，是阳气由弱而强的阶段。自日西而薄暮，是阳气由强而渐次转向衰的阶

段。所以人们的劳动多在白昼,而休息多在晚间。自然界的变化与人体生理密切相关,不完全是自然变化之适合,主要是人体功能善于适应自然环境。故《灵枢·岁露》既谓:“人与天地相参也。”而《灵枢·玉版》又说:“且夫人者,天地之镇也,其不可不参乎?”“参”即适合之义,其所以能适合,主要的是,在人这方面,并不是自然界的赐予。所以称人为“天地之镇”,“镇”即重要、主要的意思。

(四) 恒动观

恒动观念,在《黄帝内经》的学术思想中,亦处处都有体现。它认为一切物质,包括整个自然界,整个人体,都是永恒地运动着而无止息的。《素问·天元纪大论》说:“所以欲知天地之阴阳者,应天之气,动而不息,故五岁而右迁,应地之气,静而守位,故六期而环会。动静相召,上下相临,阴阳相错,而变由生也。”

动与静,统为物体运动两种不同的形式。即是说,动固为动,静亦何尝不是动。所以宋人朱熹曾指示:“静者养动之根,动所以行其静。”不能把静理解为静止不动。天体属阳,以五行之气运于上,一年行一运,如甲年为土运,经过乙、丙、丁、戊到了己年,又是土运,经过庚、辛、壬、癸,又逢甲年土运,长此运行无已,这就是“五岁右迁,动而不息。”地体属阴,以六节之气运行于下,从大寒到春分,初之气厥阴风木;从春分到小满,二之气少阴君火;从小满到大暑,三之气少阳相火;从大暑到秋分,四之气太阴湿土;从秋分到小雪,五之气阳明燥金;从小雪到大寒,六之气太阳寒水,又交到第二年了。年年如此,毫不错乱。这就是“六气环会,静而守位。”天之运,地之气,这样永恒地有规律的运动,就成为宇宙变化无穷的根源。

自然界的运动,最显著的表现现在升和降两个方面。《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清阳上天,浊阴归地,是故天地之动静,神明为之纲纪,故能以生、长、收、藏,终而复始。”《素问·六微旨大论》亦云:“升已而降,降者谓天;降已而升,升者谓地。天气下降,气流于地;地气上升,气腾于天。故高下相召,升降相因,而变作矣。”

无论升或降,都是不同形式的运动,而升与降又是互为影响的。所以升降不止,运动无已。人这个物体,也和天地一样,是动而不息。所以《素问·脉要精微论》说:“四变之动,脉与之上下。”一年四季的阴阳运动,影响到人体,血脉亦随之而上下运动。体内的血脉,它本来就是有规律的运行着的,如《素问·平人气象论》所云:“人一呼脉再动;一吸脉亦再动,呼吸定息脉五动,闰以太息,命曰平人。”由于受到外界气候变化的影响,血脉运动的规律,是要相应地发生变化的。《素问·脉要精微论》云:“春日浮,如鱼之游在波;夏日在肤,泛泛乎万物有余;秋日下肤,蛰虫将去;冬日在骨,蛰虫固密,君子居室。”春日阳生,夏日阳盛,故血脉波动,而见不同程度的浮象。秋日阳衰,冬日更衰,血脉的波动,亦因之而现不同程度的沉象。

70 不仅如此也,人体内的种种活动,《黄帝内经》称之为“神机”。《素问·五常政大论》说:“根于中者,命曰神机,神去则机息。”《素问·六微旨大论》亦说:“出入废,则神机化灭。”根于中,犹言人的生命之所以能存在,根源于体内种种功能运动,这运动,便是生命之根。如何运动呢?主要表现在呼吸出入方面。如果部分功能失常则为病,整个功能运动停止则死,即所谓“神机化灭”也。动既为生命的泉源,便不能有片刻的不动。就人而言:“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就物而言,“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因为气化升降,为物体运动的主要形式,人和物的运动都是永恒的。正如《素问·六微旨大论》所谓:“成败倚伏生乎动,动而不已,则变作矣。帝曰:有期乎?岐伯曰:不生不化,静之期也。”

运动是永恒而无期限的,唯有永恒的运动,才能变化无已时。假使静止而不动,则不生不化,生命便因之而毁灭了。

以上阴阳五行说、整体观、恒动观,贯穿在整个《黄帝内经》的各个部分。所以无论在藏象、病机、诊法、治则等理论中,都能突出地反映出来,而且是几千年来一直被历代医家奉为圭臬,在长时期的实践中获得了验证的。研究《黄帝内经》,不首先弄清这些卓越的学

术思想,实无以探其奥义。



《黄帝内经》的理论体系

前述历代医家用分类的方法对《黄帝内经》进行研究,其主要目的,就是在探索《黄帝内经》的理论体系。虽然各家的认识不完全一样,有粗有细,有繁有简,最繁的如杨上善,分做十八类,最简的如沈又彭,分做四类。其中各家的认识较能统一的,就是藏象(包括经络)、病机、诊法(包括四诊)、治则四大学说,且不问四大学说是否可以完全概括《黄帝内经》的理论体系,起码四大学说是《黄帝内经》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这一点是毫无可疑的,兹分别叙述如下。

(一)藏象学说

藏象学说不仅对人体的组织形态进行了细致地观察和描述,并且对人体各个部分的生理、特性及其相互间的关系,都作出了较精当的分析。如《灵枢·经水》说:“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藏之坚脆,府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少,十二经之多血少气,与其少血多气,与其皆多血气,与其皆少血气,皆有大数。”

说明他们对人体构造的了解,是曾经通过尸体解剖的方法来进行的。不过更重要的是,通过无数次的医疗实践,不断认识,加以论证,从而弥补了当时解剖知识的不足,学说的内容亦逐渐丰富起来,达到能指导医疗实践的高度。正如《灵枢·本藏》所说:“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藏,则知所病矣。”藏象学说这一理论的体系,可分做脏腑、经络、精气神三部分。而脏腑的内容,又由五脏、六腑、奇恒之府三方面来组成。

1. 脏腑

五脏,即肝、心、脾、肺、肾。《素问·五藏别论》云:“所谓五藏者,藏精气而不泻也,故满而不能实。”《灵枢·本藏》还作进一步的

解释说：“五藏者，所以藏精、神、血、气、魂、魄者也。”精、血、气，是五脏中存在的最宝贵的物质，故虽满而不厌其实。神、魂、魄，是五脏的功能活动。精、气、血三者，“精”与“血”固无所分，“气”则五脏各有其特性，此又不可不分者。

六腑，即胆、胃、小肠、大肠、三焦、膀胱。《素问·五藏别论》云：“六府者，传化物而不藏，故实而不能满也。”除胆为奇恒之府外，凡饮食入胃，经消化后，辗转由小肠而大肠而三焦而膀胱，或吸收，或运化，或分泌，是其所谓“实”，及至清浊攸分，清者行诸经，浊者经两肠、膀胱导之于体外，此其所以不能“满”，“满”则必为传导之有所失。

奇恒之府，即脑、髓、骨、脉、女子胞并胆。奇者，异也。恒者，常也。犹言六者虽名之曰腑，而其实却有异于胃肠等常腑。《素问·五藏别论》云：“此六者地气之所生也，皆藏于阴而象于地，故藏而不泻，名曰奇恒之府。”“地气”犹言阴气。脏腑的阴阳关系，脏为阴，腑为阳，而奇恒之府，虽名曰府，实不属阳而属阴，此其有异于常腑者一。脏与腑的基本分别是，五脏藏而不泻，六腑泻而不藏。而奇恒之府，虽名曰府，其作用却同于五脏，主藏而不主泻，此其有异于常腑者二。

脏腑虽由于功能的不同，而有攸分，但它们究竟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分工合作，彼此有相互为用的关系。如《素问·五藏生成》说：“心之合脉也，其荣色也，其主肾也。肺之合皮也，其荣毛也，其主心也。肝之合筋也，其荣爪也，其主肺也。脾之合肉也，其荣唇也，其主肝也。肾之合骨也，其荣发也，其主脾也。”“故心欲苦，肺欲辛，肝欲酸，脾欲甘，肾欲咸，此五味之所合五藏之气也。”

又《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肝生筋，在窍为目；心生血，在窍为舌；脾生肉，在窍为口；肺生皮毛，在窍为鼻；肾生骨髓，在窍为耳。”

又《灵枢·本输》说：“肺合大肠，大肠者，传道之府。心合小肠，小肠者，受盛之府。肝合胆，胆者，中精之府。脾合胃，胃者，五

谷之府。肾合膀胱，膀胱者，津液之府也。少阳属肾，肾上连肺，故将两藏。三焦者，中渎之府也，水道出焉，属膀胱，是孤之府也。是六府之所与合者。”

这一以五脏为中心，把脏腑与脏腑之间，脏腑与形体各器官组织之间，都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整体观念，是十分可贵的。

2. 经络

经络系统，可分经络、经脉、俞穴三个组成部分。

经脉深在体内，出入于脏腑筋骨肌肉之间，遍布于全身上下，头面四肢。它的作用，正如《灵枢·本藏》所说：“经脉者，所以行血气而营阴阳，濡筋骨，利关节者也。”

计有正经脉十二：手太阴肺，手阳明大肠，足阳明胃，足太阴脾，手少阴心，手太阳小肠，足太阳膀胱，足少阴肾，手厥阴心包，手少阳三焦，足少阳胆，足厥阴肝。凡此十二经脉的循行起止，手足相交，互为衔接的规律，略如《灵枢·逆顺肥瘦》所谓：“手之三阴，从脏走手；手之三阳，从手走头；足之三阳，从头走足；足之三阴，从足走腹。”

另有别于正经脉的奇经脉凡八：曰督脉、曰任脉、曰冲脉、曰带脉、曰阴跷脉、曰阳跷脉、曰阴维脉、曰阳维脉。督脉行于背，统督诸阳；任脉行于腹，任养诸阴；冲脉行于腹侧，为十二经之海；带脉横绕腰腹，有总束诸经之用；二跷、二维脉均起于足，跷脉乃阴阳二气相交之通路，维脉略具维系全身阴阳表里的意义。惟奇经八脉之名不出自《黄帝内经》，而始于《难经·二十七难》。

络脉之小者，名曰孙络，不可以数计，大者十五，计手太阴列缺，手少阴通里，手厥阴内关，手太阳支正，手阳明偏历，手少阳外关，足太阳飞扬，足少阳光明，足阳明丰隆，足太阴公孙，足少阴大钟，足厥阴蠡沟，任脉尾翳，督脉长强，又有脾之大包。凡此十五络，详见于《灵枢·经脉》。

俞穴，为经气游行出入之所，有如运输，是以名之。《黄帝内经》言俞穴的，首见于《素问·气穴论》，再见于《素问·气府论》，两论

均言三百六十五穴,实际《素问·气穴论》为三百四十二,《素问·气府论》为三百八十六,《素问·气穴论》主要是从体表部位各穴的分布来计算的,《素问·气府论》则主要是从经脉循行来计算的,去古已远,相传多失,必欲考其详实,是比较困难的。

3. 精气神

精气神,古人称为人身三宝。精,包括精、血、津、液。气,指宗气、荣气、卫气。神,即神、魂、魄、意、志。《灵枢·本藏》说:“人之血气精神者,所以奉生而周于性命者也。”

从精与气言,它是人体最基本的物质,从气与神言,它又是人体生理最复杂的功能表现。从《黄帝内经》对精气神所作的解释,便可知其一般了。

精为有形之质,为生气之所依,故《灵枢·本神》说:“故生之来谓之精。”血为水谷之精微,脏腑筋骨肌肉均赖以养,故《灵枢·决气》说:“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津亦水谷所化,体清而广润,凡组织中均不可无,《灵枢·决气》说:“腠理发泄,汗出溱溱,是谓津。”液淖而厚重,凡骨节筋会,赖以利其屈伸。《灵枢·决气》说:“谷入气满,淖泽注于骨,骨属曲伸,泄泽,补益脑髓,皮肤润泽,是谓液。”以上皆为精之属。

卫气本于命门,达于三焦,以温肌肉筋骨皮肤,慄悍滑疾,而无所束。营气出于脾胃,以濡脏腑肌肉,充满并推移于血脉之中。宗气为营卫之所舍,出于肺,积于气海,动而以息往来。正如《灵枢·邪客》云:“五谷入于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气分为三隧。故宗气积于胸中,出于喉咙,以贯心脉,而行呼吸焉。营气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脉,化以为血,以荣四末,内注五藏六府,以应刻数焉。卫气者,出其悍气之慄疾,而先行于四末分肉皮肤之间而不休者也。”

肝魂、心神、脾意、肺魄、肾志,是为五脏之神,也就是五种不同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故《灵枢·本神》说:“故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随神往来者谓之魂,并精而出入者谓之魄,所以任物者谓之心,心有所忆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志,因志而存变谓之思,

因思而远慕谓之虑，因虑而处物谓之智。”

要之，气为精之御，精为神之宅，神为气与精之用，各出于五脏，而五脏之中又各有所主：气之主，主之于命门；精之主，主于肾；神之主，主于心。《黄帝内经》中“精气神”之大略如此。

（二）病机学说

疾病的发生和变化，都有其内在的机制，这就是病机。《素问·至真要大论》一则曰：“审察病机，无失气宜。”再则曰：“谨守病机，各司其属。”它的具体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 发病

体力的强弱和致病的因素，是一切疾病发生的两个主要方面，也就是正和邪的两个方面。体强而正气充者，虽有致病因素，可免于发病，相反，体弱正衰，而病邪乘之，便不可免于病。

《灵枢·百病始生》云：“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卒然逢疾风暴雨而不病者，盖无虚，故邪不能独伤人。此必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

“虚邪”，即疾风暴雨之类，为致病因素，但它毕竟不是发病的决定条件，起决定作用的，乃在身形正气的虚与不虚。故《素问·上古天真论》说：“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评热病论》又说：“邪之所凑，其气必虚。”

2. 病因

《素问·调经论》说：“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阴，或生于阳。其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其生于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

这可说是“三因说”的滥觞。“风雨寒暑”即六淫的概括，“阴阳喜怒”即七情的概括，“饮食居处”即饮食劳倦之类。

3. 病变

疾病的变化是极其复杂的，但《黄帝内经》却能从阴阳、中外、寒热、虚实几个方面把复杂的病变概括起来，给后世对疾病的辨识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阴阳：《素问·太阴阳明论》说：“阳受风气，阴受湿气。”指病邪

的性质。又说：“阳病者上行极而下，阴病者下行极而上。”指病变的趋势。又说：“阳受之则入六府，阴受之则入五藏。”指病变的部位。《素问·宣明五气》说：“邪入于阳则狂，邪入于阴则痹；搏阳则为癫疾，搏阴则为瘖；阳入之阴则静，阴出之阳则怒。”指病变的临床表现。

中外：即是表里。表示病变部位，亦标志着病变的趋势。如《素问·玉机真藏论》云：“其气来实而强，此谓太过，病在外；其气来不实而微，此谓不及，病在中。”是外感病多为有余，内伤病多为不足。而病之在内在外，亦是变化多端的，有的“从内之外”，有的“从外之内”，有的“从内之外而盛于外”，有的“从外之内而盛于内”，有的则“中外不相及”，凡此中外表里的变化，均见于《素问·至真要大论》中。

寒热：为最常见的两种不同性质的病变。其始也，常为阴阳偏胜的结果。正如《灵枢·刺节真邪》所说：“阳盛者则为热；阴盛者则为寒。”阴阳偏盛而为寒热，因其为虚为实，内在外在之不同，其寒热之变化，亦有内外之互异。故《素问·调经论》云：“阳虚则外寒，阴虚则内热，阳盛则外热，阴盛则内寒。”寒和热的变化，往往还是互为消长的。如《灵枢·论疾诊尺》云：“故阴主寒，阳主热。故寒甚则热，热甚则寒。故曰：寒生热，热生寒，此阴阳之变也。”盖物理之常，极则必反，伤于寒者，可病而为热，热之深者，其厥亦必甚也。

虚实：《素问·通评虚实论》说：“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虚为正气的亏损，邪指病变的存在。故疾病的变化，有正虚而邪实者，有邪实而正不虚者，有正虚而无实邪者，有正虚而有虚邪者。独无所谓正实者。因正气不虚，为人体之常，不得称之为实也。

（三）诊法学说

望、闻、问、切，是《黄帝内经》诊法的具体内容，也是后世言“四诊”之所本。四诊在运用时是互为映证的，仅用一诊或二诊，均不全面，便难于辨识疾病的全貌。《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审清浊，而知部分；视喘息，听音声，而知所苦；观权衡规矩，而知病所主；按尺寸，观浮沉滑涩，而知病所生；以治无

过,以诊则不失矣。”《灵枢·邪气藏府病形》说:“见其色,知其病,命曰明;按其脉,知其病,命曰神;问其病,知其处,命曰工……见而知之,按而得之,问而极之。”诊察疾病的方法,越是全面越好。如果仅能明于察色,或者是神于按脉,或者是工于问证,总不如把望、闻、问、切四个方面都掌握好,才能叫做“不失之诊”。

1. 望诊

望诊:包括观神色、察形态、辨舌苔等内容。

观神色:《灵枢·五色》说:“五色各见其部,察其浮沉,以知浅深;察其泽夭,以观成败;察其散抟,以知远近;视色上下,以知病处;积神于心,以知往今。故相气不微,不知是非,属意勿去,乃知新故。”在疾病过程中,颜面、两目、络脉几个部分神色的变化,最为显著。如《灵枢·五阅五使》说:“肺病者,喘息鼻张;肝病者,眦青;脾病者,唇黄;心病者,舌卷短,颧赤;肾病者,颧与颜黑。”这在临床都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察形态:《素问·经脉别论》云:“诊病之道,观人勇怯、骨肉、皮肤,能知其情,以为诊法也。”勇则骨肉皮肤健壮,怯则骨肉皮肤脆弱,故有助于诊法。因从其形态的健壮与否,即可知其内在的气血盛衰。故《素问·刺志论》又云:“气实形实,气虚形虚,此其常也,反此者病。”邪实而形气实,正虚而形气虚,此为察形态之常。如果气实而形虚,其实常为邪气,形实而气虚,其实常为假象,凡此虚实之错综复杂现象,尤为诊察时之应注意者。

辨舌苔:《黄帝内经》的辨舌,虽不如后世完备,但其从舌苔的润燥、色泽、舌质、形态诸方面,已经累积了一些经验。如《素问·热论》说:“伤寒五日,口燥舌干而渴。”是为热极伤津。《素问·刺热论》说:“肺热病者,舌上黄。”是邪热入里之征。《灵枢·热病》说:“舌本烂,热不已者死。”乃热毒炽盛所致。《灵枢·经脉》云:“脉不荣则肌肉软,舌萎。”是舌的形态亦有所改变了。

2. 闻诊

闻诊,首先是闻声。正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谓:“听声

音而知所苦”也。凡五脏病变,均有闻其声而知之者,如:《素问·刺热》云:“肝热病者,热争则狂言及惊。”《素问·调经论》云:“神有余则笑不休,神不足则悲。”《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脾在变动为哆。”《素问·逆调论》云:“起居如故,而息有音者,此肺之络脉逆也。”《素问·脉解》云:“内夺而厥,则为瘖俳,此肾虚也。”

其次是嗅气味,即《素问·金匱真言论》云“肝病其臭臊,心病其臭焦,脾病其臭香,肺病其臭腥,肾病其臭腐”之类。

3. 问诊

疾病的自觉症,惟患者自己知之甚的。《黄帝内经》很重视对患者的询问,《素问·移精变气论》既曰:“闭户塞牖,系之病者,数问其情,以从其意。”《素问·八正神明论》又说:“问其所病,索之于经,慧然在前。”究竟怎样问呢?《素问·三部九候论》说:“必审问其所始病,与今之所方病。”把既往病和现在症,都必须审问清楚,才有助于对疾病的辨识,特别是《素问·疏五过论》、《素问·征四失论》言问诊特详,值得参考。

4. 切诊

切诊分切脉、切肤两部分,《黄帝内经》言切脉最详,难以备述,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几种方法。

三部九候诊法:即分诊头、手、足三部,每部各分天、地、人三候,是为全身切脉法,义详《素问·三部九候论》中。

人寸诊脉法:即兼诊人迎、寸口两处之脉,义详《灵枢·终始》、《灵枢·四时气》、《灵枢·禁服》、《灵枢·五色》诸篇。

调息法:《素问·平人氣象论》云:“常以不病调病人,医不病,故为病人平息以调之为法。”调息的准则略如:“人一呼脉再动,一吸脉亦再动,呼吸定息脉五动,闰以太息,命曰平人。平人者,不病也。”“人一呼脉一动,一吸脉一动,曰少气。人一呼脉三动,一吸脉三动而躁,尺热曰病温,尺不热脉滑曰病风,脉涩曰痹。人一呼脉四动以上曰死,脉绝不至曰死,乍疎乍数曰死。”这个调息法,一直为中医所运用。

诊胃气脉：脉变多端，总以兼有胃气为吉，不见胃气为凶，因胃气为后天水谷之本也。《素问·玉机真藏论》云：“五藏者皆禀气于胃，胃者五藏之本也，藏气者，不能自致于手太阴，必因于胃气，乃至手太阴也，故五藏各以其时，自为而至于手太阴也。”脉中有无胃气，究竟如何分辨呢？《素问·平人氣象论》云：“春胃微弦曰平，弦多胃少曰肝病，但弦无胃曰死。”“夏胃微钩曰平，钩多胃少曰心病，但钩无胃曰死。”“长夏胃微濡弱曰平，弱多胃少曰脾病，但代无胃曰死。”“秋胃微毛曰平，毛多胃少曰肺病，但毛无胃曰死。”“冬胃微石曰平，石多胃少曰肾病，但石无胃曰死。”凡属有胃气的脉，或多或少，均见其有一种从容和缓的气象。反之，徒见其躁急无神，皆属无胃气，前者多吉，后者多凶，这是屡试不爽的。

六纲脉：《黄帝内经》于脉象的分辨，最为详悉，最少它提出了浮、沉、迟、数、虚、实、滑、涩、长、短、弦、紧、细、微、濡、软、弱、散、缓、牢、动、洪、伏、芤、革、促、结、代、大、小、急、坚、盛、躁、疾、搏、弦、钩、毛、石、营、喘等数十种，不胜枚举。但它却用常见的几种脉象概括之以为纲，便不见其繁了。如《灵枢·邪气藏府病形》云：“五藏之所生，变化之病形何如？”“曰：调其脉之缓、急、小、大、滑、涩，而病变定矣。”“诸急者多寒；缓者多热；大者多气少血；小者血气皆少；滑者阳气盛，微有热；涩者多血少气，微有寒。”所概括的六脉，未必恰当，但由繁趋简，是很有这必要的。

其次是切肤。即切按上肢从尺泽至寸口一段肌肤，所以又叫“调尺”。《灵枢·论疾诊尺》云：“余欲无视色持脉，独调其尺，以言其病，从外知内，为之奈何？岐伯曰：审其尺之缓急、小大、滑涩，肉之坚脆，而病形定矣。”不过，当时切按尺肤的方法，还是配合切脉来进行的。故《灵枢·邪气藏府病形》云：“脉急者，尺之皮肤亦急；脉缓者，尺之皮肤亦缓；脉小者，尺之皮肤亦减而少气；脉大者，尺之皮肤亦贲而起；脉滑者，尺之皮肤亦滑；脉涩者，尺之皮肤亦涩。凡此变者，有微有甚。”当然，亦有单独进行切按的，故它又说：“善调尺者，不待于寸。”

(十四) 治则学说

治疗法则,是通过诊察与辨证来确定的。《素问·移精变气论》说:“治之要极,无失色脉,用之不惑,治之大则。”究竟什么是治疗的法则呢?约而言之,不外以下七个方面。

1. 杜渐防微

包括防患未然、防病传变两方面。防患未然,即相当于预防为主的思想。《素问·上古天真论》说:“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从饮食起居方面多加注意,确能增强体质,抗御种种疾病。防病传变,则为具体施治时的一种预见性措施。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邪风之至也,疾如风雨,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府,其次治五藏。治五藏者,半死半生也。”说明治必及时,才能防止病变的恶化和扩散。于显明的病变,应当如是,其不显明者,尤应及时作精细的观察,而不能稍有松懈。

2. 三因制宜

因时、因地、因人的不同而施治即“三因制宜”。《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云:“司气以热,用热无犯;司气以寒,用寒无犯;司气以凉,用凉无犯;司气以温,用温无犯。”四季寒热温凉的变化不同,对于疾病的影响亦各殊,故治疗疾病,必须结合当时的季节变化如何,庶免以热犯热、以寒犯寒之失。不过这不是绝对的,所以《素问》又说:“其犯者何如?岐伯曰:天气反时,则可依时,及胜其主则可犯,以平为期,而不可过,是谓邪气反胜者。”这是因时施治的一例。

以地而言,东南西北,高下悬殊,寒热温凉,气候迥别。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所谓:“至高之地,冬气常在;至下之地,春气常在。”人居处于不同的地带,由于生活习惯种种的不同,影响其体质和病变,往往各具有特殊性,不能一概而论。《素问·异法方宜论》言之最详可参。

以人而言,主要是体质互异,性情各别,其反映于同一疾病,亦必不完全一致,医而治疗措施,不能一律。如《灵枢·论勇》云:“夫

忍痛与不忍痛者,皮肤之薄厚,肌肉之坚脆缓急之分也,非勇怯之谓也。”痛犹病也,忍痛与否,犹言耐病与否?这即是关系于体质的强弱问题。在治疗过程,必须分别对待。正如《素问·五常政大论》所谓:“能毒者以厚药;不胜毒者以薄药。”

生活环境,性情变异,对于治疗的影响亦很大,不能不考虑到。《素问·征四失论》云:“不适贫富贵贱之居,坐之薄厚,形之寒温,不适饮食之宜,不别人之勇怯,不知比类,足以自乱,不足以自明,此治之三失也。”只知治病,而不知治病人,这种治疗方法,肯定效果不会好的。

3. 标本先后

标本,即主次的意思。六气与六经相对而言,六气为本,六经为标;脏腑与经络相对而言,脏腑为本,经络为标;病因与病症相对而言,病因为本,病症为标;先病与后病相对而言,先病为本,后病为标。凡此种种,在治疗时都应认真考虑。《黄帝内经》对此,颇为重视,故《素问·至真要大论》云:“夫标本之道,要而博,小而大,可以言一而知百病之害,言标与本,易而勿损,察本与标,气可令调。”既知病变有主次,又抓住了病变的主次,施治之时,或治其主要的,或治其次要的,完全决定于病变的客观需要了。标本固然是相对的,但原则上总以治本为主要。所以《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治病必求于本。”“本”既是主要的,解决了主要问题,次要的问题便可随之而解决,或者说亦易于解决。

要之,治本治标之道,《素问·标本病传论》说得最透,值得做进一步的探讨。

4. 逆正从反

逆治正治与从治反治,是两种绝对不同的治疗方法。逆治,是正治法。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实者泻之,虚者补之,逆其病症之性而治之,所以是正治,正对其证而治之也。从治,是反治法,寒因寒用,热因热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药性与症状相从,是谓反治,反治与正治法相反之意。所以《素问·至真要大论》说:“微者逆之,

甚者从之。逆者正治，从者反治，从少从多，观其事也。”

5. 辨证立法

辨识证候，是临证立法施治的先决问题。《灵枢·师传》说：“夫治民与自治，治彼与治此，治小与治大，治国与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顺而已矣。”顺，就是客观和主观一致，据此而立的治法，才能较确切地发挥作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故因其轻而扬之，因其重而减之，因其衰而彰之。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其在皮者，汗而发之；其慄悍者，按而收之；其实者，散而泻之。”所谓轻、重、衰、不足等因，即病证之所在，针对病症而施以扬之、减之、彰之等不同治法，是即所谓“顺”也。

总之，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是辨证的大纲，诸种治法，均须依纲而立。《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谓“阳病治阴，阴病治阳”，此阴阳之治也。又谓“其在皮者，汗而发之”，“中满者，泻之于内”，此表里之治也。《素问·至真要大论》谓“寒因热用，热因寒用”，此寒热之治也。又云“盛者泻之，虚者补之”，此虚实之治也。

6. 遣药制方

《黄帝内经》中的方药固不多，而遣药制方之大法，却源于《素问·至真要大论》“五味阴阳之用何如？岐伯曰：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咸味涌泄为阴，淡味渗泄为阳。六者或收、或散、或缓、或急、或燥、或润、或栗、或坚，以所利而行之，调其气，使其平也。”这是遣药的大法。又说：“方制君臣何谓也？岐伯曰：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有毒无毒，何先何后？愿闻其道。岐伯曰：有毒无毒，所治为主，适大小为制也。”“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君臣佐使诸制，一直为后世制方之所取法。

7. 针刺大法

《黄帝内经》针刺法的讲求，远甚于方药，其中最重要的为“补

泻”手法。如《素问·离合真邪论》所云,为“呼吸补泻法”;《素问·八正神明论》及《灵枢·官能》所言,为“方圆补泻”法;又《灵枢·终始》所云,为“深浅补泻”法;《素问·针解》为“徐疾补泻”法;《灵枢·九针十二原》为“轻重补泻”法。各种手法,于临床都有现实意义,如能练习而精熟之,临证运用,则卓有余裕矣。



如何学习《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是祖国医学现存文献中一部重要的书籍。几千年来,祖国医学无论理论研究和临床治疗方面,虽然不断地在丰富,惟其中许多带有根本性质的医学观点,基本上都是渊源于《黄帝内经》的。因此学习《黄帝内经》,是学习祖国医学过程中最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步骤。但是究竟应该怎样学习才较好呢?我没有很成熟的经验,只提出以下几个问题来谈谈,供大家参考。

83

(一) 内容提要

《黄帝内经》,包括《素问》、《灵枢》两个部分。《素问》二十四卷,自“上古天真论”起,至“解精微论”止,凡八十一篇。其中七十二篇“刺法论”、七十三篇“本病论”原缺,至宋才发现这两篇遗文补足,但多数人认为不甚可靠,故坊刻本仍缺。《灵枢》十二卷,自《九针十二原》起,至《痈疽篇》止,仍为八十一篇。两部分共一百六十二篇。

《黄帝内经》所叙述的内容,约而言之,不外十五个方面:曰阴阳五行、曰五运六气、曰人与自然、曰藏象、曰经络、曰预防、曰病因、曰疾病、曰诊法、曰辨证、曰论治、曰针灸、曰药食、曰方剂、曰护理。其中尤以阴阳五行、人与自然、藏象、经络、病因、辨证、论治、针灸、药食等九个方面最关紧要。所以如滑寿、李中梓、汪昂、薛雪等对《黄帝内经》的分类,都未能越此范围。

“阴阳五行”是《黄帝内经》的理论基础,它一方面贯彻了朴素

的唯物观点,一方面也体现了自发的辩证法思想。它明确地指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的根源是原始物质的“气”,事物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阴阳二气对抗的矛盾斗争中发展变化的。所以《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因而《黄帝内经》里所有十五个方面的内容,无不贯通了这一“阴阳五行”学说。

《黄帝内经》里还有一个较突出的理念,认为人生活在自然界中,必然受着自然界运动变化的影响,因而无论言生理、病理、治疗、摄生种种问题,都不能离开人与自然是—整体的观念。尤其在摄生、防病方面,这一理念更起着主导作用。

“藏象”、“经络”,是《黄帝内经》对生活着的人体进行观察来研究内脏活动规律的特殊学说。它虽与现代解剖生理学有近似之处,却不能完全用现代的解剖生理知识来说明,因为它更强调的是在整体观念下,抽象地阐述五脏六腑、经脉气血等不同功能相互间的“生制”关系,而为临床辨证施治最不可缺少的理论。

“病因”学说,主要包括六淫、七情、饮食劳伤三个部分,它是了解病变本质及发病规律的主要知识。

在“辨证”、“论治”部分,其辨证则以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为纲。如《灵枢·刺节真邪》说“阳胜者则为热,阴胜者则为寒”,《素问·调经论》说“阳虚则外寒,阴虚则内热,阳盛则外热,阴盛则内寒”等,虽寥寥数语,已深刻地表达出八纲辨证的奥义。自张仲景著《伤寒论》据此以发挥其大义后,一直到现在都是中医临床辨证的唯一依据。施治诸理,突出地揭示于《素问》的《阴阳应象大论》、《至真要大论》、《五常政大论》、《六元正纪大论》诸篇。凡有关施治的气味性能、辨证立法、配伍方药、制约适宜、饮食宜忌诸端,无不阐发尽致,而为临证运用的准绳。

关于“针灸”,《黄帝内经》中的内容特别丰富,尤其是《灵枢》还有“针经”之称,可以想见。单以刺法言,便有刺营、刺卫、输刺、分刺、推引、解结等三十九种之多。讨论诸病刺法,竟达六十二种,其

论刺热性病五十九穴,水气病五十七穴,理论和经验均称卓绝,其中实有丰富的宝藏可以发掘。

《黄帝内经》里记载的药物虽不多,而于辨识药物性味的阴阳、喜恶、宜忌诸问题,则隐括无遗,故诸家论本草的,无不以此为渊藪。

于此不难看出,《黄帝内经》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总结了先秦以前的医疗经验,而在于它善于运用古代唯物主义哲学原理,并以自发的辩证法观点给祖国医学奠定了朴实有效的理论基础,从来就被人们尊之为“经”,是很有道理的。

(二) 阅读方法

《黄帝内经》的内容已如上述,而其整个内容之中又都是贯穿着古代朴素的唯物辩证法哲学思想——阴阳五行学说,因而《黄帝内经》就是基于阴阳五行学说来阐明人体生理现象、心理现象、病理现象的。它认为人体的生命变化是按照阴阳的对立,五行生制的原则进行的。而自然的变化与生命的变化,都是息息相关的,因而《黄帝内经》的整体观念非常强。它认为人体脏腑的内在联系,以及和外界的联系,都是有机的统一整体。这是阅读《黄帝内经》最基本的,也是最关键的问题。

《黄帝内经》是秦汉以前的文字,应具有辨音读、明训诂的知识,才能对《黄帝内经》的文字作出较正确的理解。因经中文字,同此一字,平仄不同,意义悬殊;同此一句,句读离合,词义迥别。如《素问·阴阳别论》云:“三阳三阴发病,为偏枯痿易。”“易”应读为“施”,“施”即“弛”字。《毛诗·何人斯篇》:“我心易也。”释文云:“易,韩诗作施。”《尔雅释诂》:“弛,易也。”释文:“弛”本作“施”,是易、施、弛三字,古通用。王冰注为“变易”,便失经义。又如《素问·痹论》云:“逢寒则虫。”虫,即“疽”字,音义均与“疼”字同。王冰注云:“虫,谓皮中如虫行。”都由不辨音读,而望文生义耳。所谓训诂,即是正确地以今语解释古语,如《素问·诊要经终论》云:“十一月,十二月,冰复,地气合。”复,与“腹”字通,作“厚”字解。《礼记·月令篇季冬》云:“冰方盛,水泽腹坚。”郑注:“腹,厚也。”《素

问·诊要经终论》又云：“中心者，环死。”“环”与“还”通，还死，犹言顷刻即死。王注：“气行如环之一周则死。”不通之至。凡此之类，不胜枚举，以此说明不辨音读，不明训诂，要想正确地理解《黄帝内经》文字，是有不少困难的。

《黄帝内经》虽是谈理论的书，但绝非空洞浮泛的理论，而多半都是有指导临床实践的现实意义的。因而理解《黄帝内经》文字，一应以符合临床实践为准则。如《素问·玉机真藏论》云：“疝瘕，少腹冤热而痛，出白。”出白，犹言出汗，因剧烈的疼痛而致大汗也。白、魄古通用，这里的“出白”，和《素问·生气通天论》的“魄汗”，意同一义。故《淮南子》亦有“白汗交流”的话。疝证痛而汗出，这是临床习见的事，而旧注谓“便出色白淫浊之类”，便非习见的事实了。又如《素问·生气通天论》云：“高粱之变，足生大丁。”王注谓：“丁生于足者，四支为诸阳之本也。”这也不是临床事实，这个“足”字，只是义同“乃”字的虚词而已。所以说，我们要吸收《黄帝内经》的理论，统以能够指导临床为标准。否则，不能强作解人，而侈谈臆说。

《黄帝内经》共一百六十二篇，每篇各有其命题的中心思想，而一篇又由若干段、若干节来组成。每一段、每一节，无不有其重点的旨意，均须一一参透，得其旨意所在，才算是有了心得。如《素问》第一篇《上古天真论》，主要在阐发如何保养真精，来延长人类寿命的问题。全篇由四大段组成：第一段说明人类生命的修短，完全决定于自己如何讲求卫生之道，绝非幸邀可致的；第二段指出卫生之道，是可以通过教育，使人人都能掌握；第三段言先天禀赋不完全可恃，最可恃的还是在注意讲求卫生之道；第四段指出不同程度的讲求卫生之道，都可以获得不同程度的较高的寿命。其他各篇，均应如此会悟贯通，才能逐次地窥其全貌。

既领悟其各篇的全貌后，还要更深入地、系统地、分类地撷取其资料，使我们能够充分地掌握它。如前所述，《黄帝内经》的主要内容，不外乎阴阳五行、五运六气等十五大类，便将各篇里有关各类的

内容,分别摘录成为资料卡,各以类从,分别归档,而每一大类中,又要分做若干分目、子目,使其既细致又系统。如阴阳五行是一大类了,凡《黄帝内经》中有关阴阳五行的文字,都应归于这一类,类分做阴阳、五行两个分目,每一分目里又据其不同内容建立若干子目,这样便能把《黄帝内经》的全部内容具体掌握了。掌握了以后,无论于治疗、于科研,都有绝大裨益,这实为学习和研究《黄帝内经》必不可少的工作。如杨上善、李杲、罗天益、滑寿、张介宾等,都下过这样的工夫,只是他们都限于历史条件,不可能充分运用科学方法来分析归纳就是了。

(三)选本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读书能得善本,对于做学问是很有帮助的。什么叫做善本呢?张之洞曾说:“善本非纸白、版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通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付槧,不殊不阙之本也。故善本之义有三:一足本,无阙卷,未删削;二精本,精校精注;三旧本,旧刻旧钞。”(见《輶轩语》)因此,我们谓之善本,主要是指经过通人的精校细勘本而言。从版本的历史价值来讲,无论《素问》、《灵枢》,现在都还可以得到较古老的刻本。如《素问》有宋嘉祐刊本,绍定重刊本,金、元、明各种刊本。《灵枢》亦还可以看到元代至元庚辰刊本,明成化、嘉靖等刊本。但据我看来,都不十分高明,残缺的地方还是不少。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年出版的《素问》,是根据明嘉靖二十九年庚戌武陵顾从德翻宋刊本影印的,《灵枢》是据明赵府居敬堂刊本影印的。商务印书馆1954年出版的《素问》,是据四部丛刊影印顾本复加校刊而排印的,《灵枢》亦是据赵本排的。两者比较,后者排印本的校勘工作,略优于前者影印本。因而顾刻本《素问》,赵刻本《灵枢》,较为一般所熟悉。若以善本的标准衡量,顾、赵两刊本仍嫌其不足,我介绍几个善本的刻本如下。

摹刻宋本《素问》,光绪甲申京口文华堂刊本。这是丹徒赵云生据蒋宝素医家所藏宋槧本而摹刻的,不仅字体端整,粗看一过,确较顾本为优。如卷十一《举痛论》:“脉寒则缩蜷,缩蜷则脉绌急,绌急

则外引小络。”顾本缺末句“绌急”二字，而摹刻本则补足完好。《六元正纪大论》“天气反时，则可依时”句，顾本误“依则”，而摹刻本不误。《标本病传论》：“先病而后生中满者”句，顾本误“后先”，而摹刻本不误。虽然摹刻本与顾本同样存在错误之处，但确要少得多。（按：浙江有此复刊本，较劣。）

黄校《内经针刺》，光绪甲申黄以周校刊本，即《灵枢》。书末附《素问遗编》。字划最为端正，全书“脉”不作“脉”，“痹”不作“痺”，“决”不作“决”，“殮”不作“殮”，医籍中校刻如此其精者，实少见。

钱校《黄帝素问二十四卷附校记》，守山阁单刻本咸丰二年刊；钱校《灵枢经二十四卷附校记》，守山阁单刻本咸丰二年刊。两书均为金山钱熙祚校刻，钱校多据《难经》、《甲乙经》以及两书相互校勘，《灵枢》的残缺甚于《素问》，而钱氏于《灵枢》的校勘，独多，尤为难得。两书的校勘记，当顾尚之作，于王冰注及《新校正》语，都有所补苴纠正。无论其为或引旧说，或出己见，均极精当。因此这两部校刻本，对于治《黄帝内经》的帮助很大。原刻本已不易得，惟中医学戊辰影印本还有流通的，在古旧书店里时或可购。

《内经评文》，光绪戊戌皖南建德周氏刊本。全书仍照《素问》、《灵枢》原本分卷，为周学海澄之氏所评。这个刻本的优点有二：首先是把每篇文字，按其内容分做若干段节，读起来易于理解，这工作姚止庵也做过，但有删削，不如周氏的完整；其次是校刊较好，基本上错误很少，断句亦较正确。过去商务印书馆排印本的断句坏，不可从。至于他用乡学究评点文章的方法，架空臆说，那是没有多大用处的。我们选用这个刻本的优点，不取其缺点，对我们读《黄帝内经》仍有帮助。惟这刻本单独发行较少（我曾得一部，印制极精），一般都在《周氏医学丛书》里，而《周氏医学丛书》既有原刊本，亦有影印本，时而可以买到。

以上这四种刊本，都是《黄帝内经》较好的读本。从这几部刻本入门阅读，必然会获得与阅读一般坊刻本不同的另一境界。

（四）选注

《黄帝内经》的注本并不太多，除去名存实亡的外，兹将能见到

的书开列于下,以供大家的选读。

1. 《素问》、《灵枢》全注本

《素问》、《灵枢》全注本计有:隋杨上善的《黄帝内经太素》;明马莒的《素问注证发微》、《灵枢注证发微》;明张介宾的《类经》;清张志聪的《素问集注》、《灵枢集注节解》;清姚止庵的《素问经注节解》、《灵枢经注节解》;清黄元御的《素问悬解》、《灵枢悬解》等六种。

2. 《素问》单注本

《素问》单注本计有:唐王冰的《素问释文》;明吴昆的《吴注素问》;清高世栻的《素问直解》;清张琦的《素问释义》等四种。

3. 《黄帝内经》节注本

《黄帝内经》节注本计有:元朱震亨的《素问纠略》;元滑寿的《素问钞》;明汪机的《续素问钞》;明丁瓚的《素问钞补正》;明胡文焕的《素问心得》;明李中梓的《内经知要》;明徐春圃的《内经要旨》和《内经正脉》;明王九达的《内经合类》;清章合节的《素问缺疑》;清汪昂的《素灵汇纂约注》;清薛雪的《医经原旨》;清徐大椿的《内经要略》和《内经诠释》;清陈念祖的《灵素提要浅注》等十五种。

4. 其他节本

它如《灵枢略》(不著姓氏)、沈尧封的《医经读》、余正燮的《持素脉篇》,都节文而无注。

5. 专题注本

刘完素的《素问玄机原病式》,刘温舒的《素问运气论奥》,罗美的《内经博议》,黄元御的《素灵微蕴》,程扶生的《医经理解》,方本恭的《内经述》等,都是据经而各自发挥议论者。

6. 校勘本

胡澍的《内经校义》,俞樾的《读书录》、《内经》部,孙诒让的《札迻·素问》,廖平的《内经平脉考》、《诊络篇补正》、《营卫运行考》、《三部九候篇补正》、《人寸诊补正》、《诊骨篇补正》、《诊筋篇补正》,陆九芝的《内经难字音义》等,都属于训诂、校勘、考据一类的

书,对于阅读《黄帝内经》都有帮助。读者根据自己的条件进行阅读就行了。

(五) 精读

至于上述的二十五种注本,究读哪几家注本较好,各家各有其优缺点,都能阅读一遍最好了。如不可能,可以尽先选择几家来精读,这是非常必要的。

如杨上善的《太素注》,最该精读。因杨注实为诸家注之所本,对杨注有较深的体会后,便有了权衡诸家注的基础。如杨注《素问·刺禁论》“藏有要害,不可不察。肝生于左,肺藏于右,心部于表,肾治于里,脾为之使,胃为之市,膈育之上,中有父母,七节之傍,中有小心”一段云:“五藏之气所在,须知针之为害至要,故欲察而识之。”只此“五藏之气所在”一句,便把全段的主要内容和中心思想,都揭示无遗了。而后世的王冰注、马蒔注、吴昆注、景岳注、志聪注等,都没有揭示出这个精神,惟高世栻据《太素》略有体会,而曰:“五藏之气,从内达外,由经隧而出于孙络皮肤,有紧要为害之处,不可不察”云云。的确,这段文字如不从脏气方面来体会,是要发生种种误解的。

除精读《太素注》而外,他如王冰注于五运六气的发挥,马蒔注于针灸经穴的详解,吴昆注于篇章大义的阐述,景岳注于五行生化的究诂,志聪注于就经解经的深切,高世栻注于字句文义的参订,无不各有专长,能各取其所长而融会贯通之,进而参阅诸节注本,便可是非判然,明辨诸掌矣。